



1950年代，武汉硚口兴建工业区，从3506、752等军工企业到新华印刷厂、武汉汽车配件厂等国营工厂，生活设施和职工宿舍多为红房子，带有苏式建筑文化风情。1990年代，伴随企业改制或外迁，红房子陆续拆除，目前仅少量留存。

图为2011年秋，宗关建一路湖北水利工程局大院一角。1953年修建，左图为大礼堂和职工宿舍楼，右图为大礼堂南门，约2017年拆除开发。

（摄影 / 撰文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张智勇 陈胜利

陈红英 林伟 谭艺琴 潘红莲

燕来宾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辑：许濛 刘玮

封面设计：王鹏

时代年轮

<<< <

4 1954，武汉儿童医院和孩子一同生长 / 高琛琛

风雨同舟

<<< <

12 以盟员之力体察“民之关切” / 李 奕

九城同心

<<< <

16 千年古城的蝶变
——“蒲圻”更名“赤壁”纪事 / 冯晓光

委员天地

<<< <

22 我与武汉杂技团共成长 / 梅月洲

人物春秋

<<< <

27 武汉大桥工程局首任局长彭敏 / 王 钢

35 清末民初武汉商界大亨吕超伯补传 / 张胜林

目录

CONTENTS

都市史话



40 两枚徽章承载百年消防史迹 / 陆时正 徐莹秋

往事漫忆



44 格里希无时不在我“身边”
——我给“洋厂长”当助理之二 / 李 兵

史海钩沉



50 民间文献《灵泉志》中的明楚昭王墓营建（下）
/ 李 贝 宋 贝 李绿雨

高校访馆



56 从战国弩机到共和国女子交警队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 / 周 斌

目录索引



59 本刊 2024 年总目录

63 征稿启事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zsl@163.com

1954，武汉儿童医院和孩子一同生长

◇ 高琛琛

轮印：1954年12月26日，武汉儿童医院诞生，成为新中国建立的首批儿童医院之一。在华中地区，为最早创建小儿外科的两家医院之一，并率先突破小儿心胸外科禁区。目前，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儿科第一方阵，年门急诊量300万余人次、出院量11万余人次、手术量4万余台次、分娩量超1.1万人次。

2024年12月5日，阳光正好，武汉儿童医院绿树繁茂，建筑气势恢宏，卡通指引牌童趣十足，阳光音乐台琴声叮咚，孩子们快乐奔跑，孕妈妈笑靥如花，四处散发着勃勃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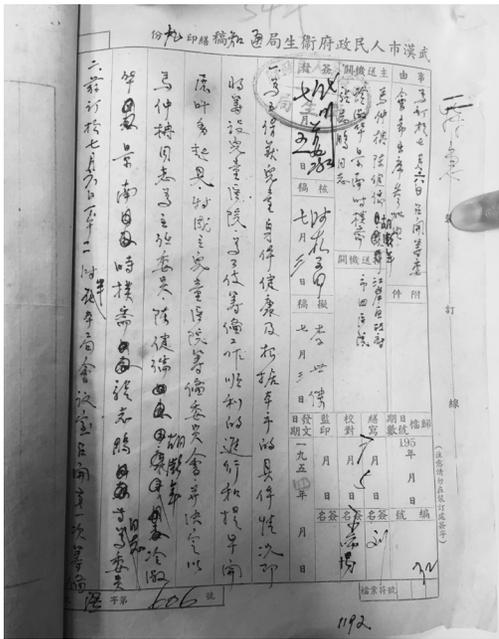
时光穿梭到70年前——1954年12月26日，武汉儿童医院诞生，成为新中国建

立的首批儿童医院之一。从此，它呵护着千家万户的孩子健康成长，担当他们的“人生第一站”，自身也不断发展壮大。

白手起家，从40张病床出发

新中国成立前，武汉三镇没有儿童专科医院，孩子生了病，只能去成人医院或私立诊所，市区婴幼儿死亡率达20%。

1954年，我国进入“一五”时期，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国民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出生人口随之大增。15岁以下儿童人数，从1949年的34.3万增至54.21万，加快儿童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步伐迫在眉睫。5月，中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开始筹建武汉儿童专科医院。



1954年7月，武汉市卫生局筹备儿童医院文件

12月26日，武汉儿童医院在黎黄陂路43号成立，仅有2层和4层楼房各1栋，总面积不足500平方米，初设病床40张。卫生技术人员从市二医院、汉口天主教堂医院联合医院儿科调来，设备器械只有几十副听诊器、几台显微镜和一台最基本的X光机。然而，急需门诊和住院诊治的患儿日渐增多，不能适应儿童医疗保健业务发展的需要。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武汉市政府在球场路109号建设新院，1955年迁入。当时的球场路，两旁水塘菜地，四周棚户散落，只有7路公交车通达。好在地方宽敞，为后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条件。

1958年，虽然长江大

桥已经通车，但武昌、洪山、青山居民来汉口，轮渡仍是过江的主流交通方式，儿童医院为方便孩子就医，在临近码头的胜利街开设门诊部。没有汽车运送，大家拖着板车拉桌椅橱柜，肩扛条凳，手拿医疗器械，在球场路、胜利街之间来回小跑。

胜利街门诊部开诊后，大受居民欢迎。那年夏天，日门诊量每天超过1000人次，比球场路本部还多，夜班医生从下午5时30分一直工作至次日早上8时交班。在那个酷热繁忙的夏天，马仲桷院长常会无声息地在每人桌上放上一杯凉茶或酸梅汤。

创业之初，在首任院长马仲桷的带领下，大家全力以赴投身医院建设，不断丰富诊疗业务门类，打造出传承至今的“儿医精神”——“爱院敬业，勇夺第一”。

1954年，入院不久的21岁医生董宗祈考入广州中山医院，三年后回到医院创建呼吸内科。1960年7月，他又参加吉林医科大学主办的基础医学师资进修班，主攻病理解剖学。结业后与同事鲁建生一起建立病理室，从事病理分析工作长达17年。他在显



1955年，儿童医院迁入汉口球场路109号

显微镜下，对大量患病脏器切片进行观察描述，完成4万多份病例，练就一副“火眼金睛”。身为临床医生和病理医生，他成为医院呼吸内科、病理科奠基人，荣获“中国儿科医师终身成就奖”。

董宗祈作为小儿呼吸内科老专家，古稀之年，披挂上阵担任武汉市医疗队组长与SARS病毒较量；八旬高龄，开着电动轮椅到门诊为患儿看病；抗击新冠病毒的关键时刻，穿着防护服坚守门诊，身影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晚大屏。

四处求师，创立小儿外科填补空白

建院之初，医院仅有内科，遇到突发阑尾炎、腹膜炎、肠穿孔的患儿只能转院，有的因辗转而增加痛苦、耽误治疗。

年轻的内科医生江泽熙，见到不少这样的孩子。一个患腹膜炎的小男孩肚子鼓得老高，转院前瞪大眼睛望向她：“江阿姨，我能治好吗？”她心里一颤，安慰道：“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江泽熙心弦触动：“如果孩子能在自己医院做手术，那该多好！我何不‘改道’学外科？”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从事儿科四年即将晋升主治医师时冒出来。

1957年，中央卫生部委托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承办全国小儿外科医师培训班。江泽熙主动请缨，成为1959年第三班学员，师从小儿外科学鼻祖张金哲教授（后为中国



董宗祈主任（左二）查房

工程院院士）及潘少川、黄澄如等教授，她日夜泡在手术室，学习钻研如饥似渴。

从北京回汉后，江泽熙又多次到同济医院，求教于我国著名外科学家、现代小儿外科的创始人之一童尔昌教授。童教授当时生病住院，就在病床旁耐心传授，从手术包内血管钳、拉钩到消毒规范、人员配备等事无巨细。童教授后来受聘为武汉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在医疗、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卫生局又从市一医院调来成人外科经验丰富的宋育龄主治医师加盟。

建院之初，曾是外科医师的儿科主任胡彭年颇具先见之明，设置了一套“迷你手术室”——无菌手术室二间、有菌手术室一间及准备间，捐出自用的德国产手术器械，为筹备外科预留了硬件设施。

1961年11月6日，小儿外科正式成立，设病床30张，完成的第一例手术是为17岁中学生施行“阑尾切除术”。此后，小儿外科逐渐发展，主要开设新生儿外科、泌尿外科、骨科、烧伤科等专业，填补了湖北省乃至华中地区小儿外科的空白。



胡彭年主任（中）查房

巡回医疗，在乡下设立简易手术室

1970年代，医院扩大院区至现香港路，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不仅邻近省、市，远在新疆、西藏和东北地区的患儿亦慕名而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精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武汉儿童医院在市卫生局组织下，派出多批次

专家医疗队，前往农村送医送药。

外科老专家胡家高保存的老照片中，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墙上贴满报纸，一束光从左侧打过来，照亮医生的操作部位。

“这张照片摄于1976年6月。已经不记得照片里这位患儿具体得的是什么病，但是对当时的艰苦条件印象深刻。”今年78岁高龄的胡老回忆说。

当年2月至8月，医院医疗队在松滋县（现松滋市）开展巡回医疗，发现很多患儿得不到及时治疗，更难以去武汉做手术，令人又心痛又着急。

胡家高和同事决心改造出一间简易手术室，就地为患儿做手术。为达到无菌条件，给石灰墙壁糊上报纸，再用消毒剂熏蒸消毒。房间光线不好，只有一台落地灯照明，每次做手术，就得安排人举着长柄手电筒补充照明。就这样，胡家高和同事在艰苦条件



1976年6月26日，医疗队在松滋县巡回医疗，胡家高主任在田头授课、在简易手术室做手术



1980年代初，江泽熙主任（左一）讲解心脏模型

下施行手术，为一个个患儿解除病痛。

在那个艰苦年代，这是儿医人勇担社会责任的一个缩影。同时，儿医人还参与防汛（抗震）救灾、援助院外医疗以及支援三线基地建设、卫生检疫、城乡社会医疗服务等工作，为灾民、工人和农民送医送药。

再破禁区，攻克先天性心脏病难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医院以医疗为中心，坚持医院管理体制改单革，从此进入全新大发展时期。

那时候，小儿心血管外科手术在武汉仍属空白，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只能千里迢迢到京、沪求医，不少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夭折。

1980年代初，医院党委决策：以开展小儿心血管疾病的内科诊断和外科心脏直视手术为突破口，带动全院综合诊疗水平提高。内科王祖智负责心导管检查技术，外科

江泽熙带领心内、外科体外循环等团队赴湖北省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学习。

此时，江泽熙年过半百，已是“功成名就”的专家，但她临危受命，不惧风险，毅然再次拓荒，挑战小儿心胸外科禁区。她和同事在成人心胸外科进修后，产生一个大胆想法——进行动物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实验。她不顾年龄偏高体力不济，硬着头皮固定二三十斤重的大狗，给它们清洁、剃毛、抽血，在体外循环转流下做心脏手术。为了监护术后情况，一向爱干净的她，在酷热的夏夜，不管体味骚臭难闻，不顾蚊子跳蚤叮咬，睡在实验狗身

边，静静观测其呼吸和心跳。见到狗苏醒，能吃东西了，她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跳起来：“它活了，它还活着！”这一实验，为正式开展临床心血管手术打下基础。



1991年5月，江泽熙主任为患儿检查

一次，江泽熙被实验狗咬伤，注射狂犬疫苗后严重过敏，四肢抽搐，高烧不退。医生让她住院，她坚持“实验在关键阶段，我必须尽快回到岗位上去！”几天后稍感缓解，她又继续投入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12月，江泽熙、朱达清、黄德樱、余希临共同协作，开展首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成功为6岁男孩施行室间隔缺损修补术。

1985年，医院又派江泽熙等一行17人，赴国内最先开展小儿心血管外科手术的上海新华医院学习一年，得到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开拓者、该院丁文祥教授团队的全方位指导。

厚积薄发。1986年3月，江泽熙和同事成功独立施行房间隔缺损修补术，突破小儿心胸外科的禁区，在省内首创小儿心胸外科，填补了我国中部地区的空白。此后，医院手术水准跃居全国儿童医院前列。1988年，市卫生局将医院小儿心血管内、外科列为重点建设与发展专科之一。

1992年5月31日，《长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市儿童医院心血管外科学国内先进赶世界水平 手术水准跃居全国儿童医院前列》，介绍医院的探索经验：“市儿童医院心血管外科在追赶世界先进医疗技术的过程中，找到一条‘捷径’：在国内同行已引进消化的国外先进医疗技术高起点上起跑，6年时间走完国外医学界20年才走完的路，婴儿心血管手术紧逼世界先进水平。”

1990年代初，江泽熙与中国小儿泌尿外科奠基人黄澄如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儿童义诊

金哲教授、上海新华医院余亚雄教授、武汉同济医院童尔昌教授等，先后应邀参加新加坡、日本等国举办的国际小儿外科学术会议，获得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医院迎来大发展。1988年，增设急诊科、主任专科门诊，扩大心脏内外科、肾病泌尿内外科及遗传病、血液病、颅脑外科、胸部外科、新生儿外科及中医疳积、血管瘤等专科门诊，开放床位420张，分设11个病区，科室设置进入全国儿科医院先进行列。

1993年，新病房大楼落成启用。外科开设床位144张，分为一外科（矫形外科），二外科（普通外科、脑外科、肿瘤和烧伤外科），三外科（心、胸外科、泌尿外科、新生儿外科）。

出动直升机，接力救助恩施患儿

武汉儿童医院在苦练内功服务周边的同时，一直在探索：如何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的服务半径，惠及更多患者？

“大家好，今天我画了一朵花，它漂亮吧！”大大的眼睛，天真的话语，5岁恩



2019年，直升机转运恩施患儿

施男孩小恩（化名）惹人喜爱。谁能想到，2019年在他两个月大时，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肺部感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疾病，曾经命悬一线急需手术。小恩所在的恩施州中心医院，向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牵头单位——武汉儿童医院求援。

路途遥远，如用救护车转运，至少需要8小时，孩子经不起折腾。反复讨论多套方案后，转运团队将天气条件较好的宜昌作为“中转站”，将小恩用救护车从恩施送往宜昌，再用直升机“接力”送来武汉。通过三地地上空中“无缝衔接”，小恩平安抵达武汉儿童医院。跨越500公里，小恩得以及时手术转危为安，如今已上幼儿园大班。

一条条救援通途，伴随着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庞大体系的日臻紧密，烙刻下无数患儿家庭回归圆满的温馨画面。

2016年，武汉儿童医院牵头成立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联盟单位达229家，形成“1个龙头医院+17个地市级核心医院+N个县市级医院+乡镇及家庭医生”的“1+17+N联盟”。联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培养基层儿科医生，构建区域儿科医疗服务新体系，畅通双向转诊，打造儿科分级诊疗的“湖北样板”。

2019年，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与12家区级妇幼保健机构携手共建妇幼健康共同体，通过信息共享、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共建重点科室等探索新模式，进一步织牢、织密健康守护网。

让孩子们看上病，也要保证看好病。武汉儿童医院坚持医疗和慈善并举，与50余家慈善机构合作，开通转诊及慈善救助绿色通道，累计救助困难大病患儿1.5万余人次。

一体两翼，沌口光谷落下两枚棋子

1992年，武汉儿童保健所与武汉妇女保健所合并，组建武汉妇幼保健院，承担全市儿童保健、孕产妇优生优育的管理和指导工作。2003年9月，武汉儿童医院与武汉妇幼保健院“强强联合”，组建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妇女儿童专科医院。2016年8月，挂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第六临床学院。2018年10月，获批湖北省儿童医疗中心。

从胎儿期开始，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妇幼保健院为妇女儿童提供全生命周期医疗保健服务，建设十大诊疗中心，践行分级诊疗，科研与教学实力、管理与服务能力持续提升，获得广泛社会赞誉。

曾经，不少武昌、汉阳市民都有这样的经历，孩子夜里生病只能“过江”到汉口



武汉儿童医院一院三区

就医。如何让孩子就医更便利？医院高举公益性大旗，推进优质资源均衡分布，数年前勾勒出“一院三区，一体两翼”的规划蓝图，分别在沌口和光谷落下两枚棋子。

2022年，沌口院区开诊，填补了大汉阳地区三甲儿童和妇幼专科医院的空白，辐射武汉西南地区及白沙洲地区。

2023年，光谷院区正式开工，为湖北省儿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辐射鄂东南地区。

同在2023年，武汉儿童医院主院区新妇幼综合大楼正式开诊，堪称华中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妇幼保健综合大楼之一，不仅硬件再次升级，而且设置多个特色专学科，进一步完善妇幼保健专科体系，为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驾护航。这一场改善武汉800万妇女儿童就医条件的及时雨，有力提升了患者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武汉儿童医院荣获市属医疗机构中唯一“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并跻身“全国百佳医院”“全国爱婴医院”“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全国人文医院”行列。

如今，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妇幼保健院，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成为一所华中地区大型三甲妇女儿童专科医院，拥有47个临床科室和16个医技科室，年门急诊量300万余人次、出院量11万余人次、手术量4万余台次、分娩量超1.1万人次，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儿科第一方阵。

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也是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在新的征程上，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妇幼保健院，将护航妇女儿童健康，引领湖北省妇幼医疗卫生事业创新发展。

高琛琛，武汉儿童医院宣传科负责人

以盟员之力体察“民之关切”

◇ 李 葵

人物名片：李葵，民盟省委人资环专委会副主任、市委人资环专委会主任、洪山区工委委员，省政协委员、洪山区政协委员，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少年时代，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讲演》深深感染了我；青年时代，在珞珈山顶瞻仰闻一多像时初识民盟。

经好友介绍，我了解到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革命先驱李公朴、张澜，学术大家钱伟长、费孝通、梁思成、华罗庚等皆是民盟人，这些民盟先贤们“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爱国情怀让人敬仰。

在榜样的感召下，2012年我坚定地加入了民盟。在各级盟组织的关心和培养下，我将自己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问题和思考建议写成社情民意信息，持之以恒地建言献策。

在学习中摸索提升

经过新盟员培训班的学习，我对盟员的政治责任更加清晰了。2012年前后是武汉城市建设的高峰期，武汉市开展了规模宏大的道路、排水改扩建工程。与此同时，工程车肆意超速、闯红灯的现象频发，经常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我将所见所感和身边群众的呼声撰写成社情民意，提交《加强工程车管理的提议》。

2013年，政府部门展开各种形式的生态文明建设行动，我结合工作中的思考撰写《同心同德，建设生态文明武汉》；2014年，除夕不放假引起社会舆论热议，我从传承民族文化和维护社会公平角度出发，撰写并提交《关于将除夕纳入国家法定假日的建议》。

盟组织发现我有参政议政的专业基础和热情，为我提供多种学习机会。我先后参加了区盟、市盟和省盟组织的各类党外青年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办公厅

致谢函

市民盟并李奕盟员同志：

按照全市立法工作的总体部署，《武汉市供水用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研究出台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在《条例》草案的征求意见建议工作中，贵单位和市民盟盟员、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奕同志，经过认真调研，提出了十余条修改意见建议。同时，经贵单位和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的委派，李奕同志参加了由司法局组织的《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并在会上对《条例》积极建言。市司法局等单位认真研究，向我们反馈，贵单位和李奕同志提出的涉及《条例》草案中的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五十六条等修改意见建议质量较高并已被采纳。

在此，对贵单位和李奕同志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扎实深厚的学术能力和对我市民生等事业发展高度关心高度支持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希望贵单位

有关建议质量高收到致谢函

读书班、骨干盟员能力提升班，政治把握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2017年，我被吸纳人民盟市委青年委员会，承担调研课题《加强武汉市水污染防治，建设滨水生态绿城》。我与课题组成员齐心协力，从发改、水利、环保、住建、市政等相关部门，全面搜集水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和工程建设资料，深入调研黄孝河、巡司河、马影河、南湖等多个污染严重的河湖水体，走访了大量群众，系统分析武汉市水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的不足之处，提出针对性较强的建议。

调研发现，我国各种环境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口众多”。在欧美，百万人口的城市凤毛麟角，如德国首都柏林人口不足四百万，汉堡、慕尼黑和科隆作为德国规模前四的城市，人口规模不过两百万。相比之下，武汉作为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在较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人口，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和人口的聚集速度

存在不匹配，更需要大魄力、有针对性的措施治理各类污染。

我们撰就《关于加强武汉水污染治理的几点措施》，被列为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重点提案。2018年7月，我在市政协加强武汉水污染治理界别协商会上，做了“关于加强我市水污染治理的建议”主题发言，被《长江日报》专刊报道。之后，我一如既往参与武汉市黑臭水体治理民主监督，受市民盟委托参加《武汉市供水用水条例》征求意见座谈会，提出多条建议均被采纳。

在热点事件中捕捉端倪

2020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多地随意出台隔离措施，湖北人在外地受到不公平待遇。我发现此类事件不仅损害湖北人的合法权益，还造成地域隔阂，影响深远。于是我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建议制定统一、合情合理、合法的隔离措施标准。该信息被民盟中央采用，几天后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国家对此类问题明确了应对要求。

2021年初，接连发生的特斯拉刹车事件引发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车主要求特斯拉提供行车原始数据遭厂家傲慢回应，在政府多个监管部门发声后才同意提供数据。汽车行业已进入智能化时代，每台汽车都是移动的信息采集终端。但当时电动汽车不仅在性能和安全方面缺乏完善的标准，而且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巨大漏洞，影响国家信息安全。于是我撰写并提交《关于智能汽车时代加快建立国家标准和加强行车数据安全管理的建议》，该信息被全国政协综合采用。不久，相关部门针对电动汽车数据安全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

同一年，国内发生多起恶犬伤人致幼



参政议政荣誉证书

童死亡案例，群众对违法饲养大型犬只、遛狗不拴绳等行为反映强烈。我在洪山区政协会议上提交《开展养犬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的建议》，提出开展养犬专项整治行动，对犬只销售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建立完善宠物管理信息系统，依法整治违法养犬行为，促进文明养犬等建议。该提案得到洪山区公安、城管等多部门的积极回应，区内违法养犬的行为得到了很大改善。

在专业领域里建言献策

环境科学专业背景让我对于优良生态环境有着深刻认知，而在环保和水利行业工作练就的专业素养，使我能够敏锐发现一些苗头性问题。生态文明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和偏差，是我深入思考并努力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动力。

2021年，我在三峡库区调研时发现当地山高坡陡，农业生产条件极其艰苦，果农往往需要手足并用在果园里攀爬劳作。与此同时，柑橘树下植被受损、水土流失严

重影响到库区水质安全，传统坡改梯工程因影响果树产量，得不到果农支持而推进困难。

我深入思考、寻找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改善的结合点，撰写提交《警惕三峡库区柑橘过度种植威胁长江保护成效》社情民意信息，建议通过坡改梯、修建田间道路等措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拦截污染物、保护库区水质。该信息被全国政协单篇采用。

在工作调研中，我发现一些闸坝工程造成水系生境阻断，不利于长江大保护，便撰写《开展我省中小河道拦水坝生态化改造，重建生物洄游通道的建议》，被民盟省委评为2022年度优秀调研成果。

除了撰写社情民意信息，我还利用政协委员身份积极推进长江大保护的具体实践。2023年在十堰市茅箭区参加小流域调研时，恰好看到当地为改变河流枯水期水量少、景观不佳的问题，在一条小河上修建拦水坝以改善河道水景观。

因该拦水坝高度仅50公分且上游来水自由漫溢，并不涉及取水用水，工程设计单位和主管部门并未意识到该工程会对河流产生不利影响。我发现在枯水期这条小河过水断面为一条宽度不足5米的河槽，而修建拦水坝后形成一条近30米宽的台阶。虽然拦水坝上下游水量没有改变，但河流的生境连续性将被破坏，下游的鱼类将不再具备洄游至上方的条件。

我当即向陪同调研的当地负责人提出建议，通过在拦水坝一侧修建十余米长的平

缓溢流通道，达成蓄水与生境连通的目标统一。该建议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当即要求对原施工方案予以修改完善，并要求对所有在建和拟建拦水坝参照整改。

与本职工作相辅相成

参政议政工作也提高了我的政治站位，从以往埋头蛮干转变为主动思考国家战略需求与我本职工作的连结点，从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参与长江大保护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关于三峡和南水北调两项重大水利工程对我省环境影响的研究一直局限在河道内，对于流域面上影响的关注较少。而江汉平原不仅是湖北省的核心区，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要地，地下水变化可能对江汉平原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对此，我提出开展湖北省长江干流沿岸地下水监测工作，并建成系统、科学的沿江地下水监测站网。在此项工作中，我发现江汉平原不同地区的地下水与长江水位的相互作用规律具有显著差异，部分地区地下水污染风险较大，于是撰写提交《加强江汉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建议》，被民盟中央采用。

我在2020年布设地下水监测站网时，在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调研的鄂州峒山村布设了一组监测点。而今年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嘉鱼潘家湾四邑村蔬菜长廊，他踏足的蔬菜地东西两侧不到500米距离，我们各布设了一个地下水监测点，用于监测长江水位及地下水变化对农田生态的影响。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这片监测区域关心农村工作，我们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李奕在黄梅小池横坝头渡口

决心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方面进一步做深做实，做出佳绩。

因为对我参政议政工作的认可，民盟中央先后授予我2021、2023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工作个人，民盟省委先后授予我2021、2022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以及2017—2020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突出贡献个人，有关社情民意被市委统战部评为2024年优秀参政建言等荣誉。

这一项项接踵而来的奖励，不仅是崇高的政治荣誉，更是沉甸甸的使命和担当。每当看到自己反映的问题得到政府重视，并有具体措施时，满满的成就感甚至超越荣誉本身。不久前公布的2025年放假安排中，除夕终于纳入法定节假日。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个进步应该也有我十年前所撰信息的一份作用吧。

千年古城的蝶变

——“蒲圻”更名“赤壁”纪事

◇ 冯晓光

位于湖北南大门的县级市赤壁，原名蒲圻，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黄武二年（223年），吴王孙权于长江南岸设立“蒲圻”，并传说为之赋诗“蒲草千里，圻上故垒。菴蒲五月，川谷对鸣”。县治竞江口（今西凉湖畔衙门咀），地域相当现在的蒲圻、嘉鱼、崇阳、通城等县，吕岱为首任镇牧。

此后蒲圻县治又经几番变迁，唐贞观七年（633年）迁鲍口，之后再无变迁，只分置崇阳、通城、嘉鱼三县。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蒲圻撤县设市。1998年，蒲圻更名为赤壁。此时蒲圻这个县名，已经沿用了1700多年。

城市名称不只是一个语言符号，更是认识和区分一个城市最显著的标识。蒲圻更名赤壁，1995年开始启动，克服重重困难，三年后才得以成功。我和父亲冯金平是更名工作的参与者，也是这一重大事件的见证者。

一场没有硝烟的“赤壁之争”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之一，在战争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冬，曹操亲率20万大军进攻东吴。孙刘联军利用曹军不善水战之短，用火攻大破曹



江泽民同志题“三国赤壁古战场”

三国赤壁古战场
江泽民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

军。其时，“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倾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这次战役，孙刘联军以少胜多，智取强敌，为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对于赤壁之战的发生地点，古人虽有一些争议，但在唐宋时已作结论，公认发生于蒲圻赤壁。南宋资政殿学士、诗人李壁，眉山丹棱县人，他在《赤壁》诗中曰：“赤壁危矶几度过，沙羡江上郁嵯峨。今人误信黄州是，犹赖《水经》能正讹。”非常鲜明地对其老乡苏轼的地理错误予以纠偏，指出赤壁之地不在苏轼所作前后《赤壁赋》的黄州。康熙年间，黄州知府郭朝祚为了与赤壁之战的蒲圻赤壁相区别，特将黄州赤壁命名为“东坡赤壁”，并亲书门额。

1977年10月6日，著名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丁力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赤壁究竟在何处》，该文大意就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在蒲圻。为了与丁力文章相呼应，蒲圻县革委会主任石昌炎找到正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我父亲冯金平谈话，要他写文章介绍蒲圻赤壁。

当年10月10日，冯金平首度在香港《周末报》发表《古战场赤壁胜迹》一文。次年

8月27日，又在《长江日报》发表《何处赤壁古战场》一文；同时还在《福建教育》《人民日报》《湖北名胜》等报刊发表大量介绍赤壁胜迹和赤壁文物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出现，也引发了黄州方面的呼应，他们不断在报刊发文宣传“东坡赤壁”，有时称“文赤壁”。那时他们的文章只谈东坡赤壁，同时也承认古战场赤壁在蒲圻。

小小的“赤壁热”引发了一位先生出来“叫板”，那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古地理研究所的吴应寿先生。1977年12月1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也谈赤壁在何处》一文，该文全盘否定蒲圻赤壁，主张古战场赤壁在江夏。为了全面反驳吴应寿先生，冯金平对江北一线作了深入调查，翻阅大量历史文献，1978年在《文史哲》第五期上发表《赤壁古战场考辩》一文。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史学界加入大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旅游业的兴起，名地、名人效应被各地重视，中国史学界对于这场战争中的“赤壁”地望问题开展讨论，诸说并起，愈演愈烈，爆发了一场关于争夺赤壁古战场的“新赤壁之战”。一时，蒲圻、黄州、钟祥、武昌、汉阳、汉川、嘉鱼等“江汉七赤壁”纷纷亮相。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可畏先生、湖北大学张国光先生、武汉大学唐长儒先生、黄冈师专黄海鹏先生等人纷纷写文章支持蒲圻赤壁说。持江夏赤壁说的冯亚健、黄红军也纷纷亮牌。为了维护蒲圻赤壁说，著名文史专家、书法家吴丈蜀先生在其主编的《荆楚文史》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参与论战。

1988年4月8日至12日，《三国演义》首次研讨会在蒲圻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湖北高校李梅吾、张国光、冯天瑜及国内其他大学的一些学者。当时，黄冈师专青年讲师贺亚先在会上大谈黄州赤壁不仅是文赤壁，还是武赤壁，是“文武双全”。他的言论当即遭到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有理有据的驳斥。

1989年4月26日至30日，《三国演义》第二次研讨会在钟祥举行，会议主题是“三国演义与钟祥”。大会认为确定赤壁之战地址，必须靠地下发掘和历史考证。

1990年10月7日至10日，《三国演义》第三次研讨会在黄冈举行，当地组织几篇文章继续宣扬“文武双全”说，同样遭到张国光教授的“炮轰”。冯金平在会议最后一天赶到黄冈，被安排大会发言，发言完后即大会闭幕。李梅吾教授致闭幕词称：文武赤壁相得益彰，蒲圻黄冈各得其所。

1991年7月，蒲圻、黄冈两地赤壁之争进入高潮，各自造势。7月1日至3日黄冈举行“黄冈赤壁文武双全”研讨会；7月3日至6日，蒲圻召开“蒲圻赤壁古战场保护、开发、建设研讨会”，双方以大阵容、高规格进行比拼。蒲圻研讨会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一书。

此前坚持江夏赤壁说的上海复旦大学古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先生，也给冯金平来信称：“江汉间濒江之山称赤壁者殊多，

当地人辄以为汉末周瑜破曹操之处，何者为是，讫无定论。唐李贤注《后汉书·刘表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固无一不言在乌林对岸之鄂州蒲圻也。”不久谭先生去世，这不能不说是他对赤壁之争的绝笔。

湖北省第四次、全国第七次《三国演义》研讨会，1991年10月20日至25日在江陵召开。会上绝大多数学者均肯定曹操大军夺取了江陵。1992年，围绕第三组、第四组《三国演义》邮票发行，蒲圻、黄冈再次为争夺发行权展开角逐，省邮票公司邀双方代表到武汉辩论。冯金平代表蒲圻参加，黄冈则邀请省《三国演义》学会会长李梅吾先生出席。李先生是黄冈人，但他并不主张黄冈说，而是表示：有冯金平参与我就无话可说了。他当即电告黄冈，辩论失败。因李教授承让，蒲圻顺利争得发行权和创意权。

湖北省第五次、全国第十次《三国演义》研讨会，1995年5月7日至10日在当阳举行，蒲圻市旅游局局长吴纯法及冯金平2人与会。冯金平在会上作了《长坂坡之战与赤壁之战》发言。后来，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秘书长沈伯俊先生将此文收入成果文集中。

这一时期，蒲圻赤壁研讨会一个接一个，宣传力度空前，而其他赤壁说则悄无声息，一场“新赤壁之战”落下帷幕。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教授李梅吾如是说：“历史就是历史，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要尊重历史。”

一番几经周折的更名之旅

蒲圻更名赤壁，冯金平从1991年开始动议，此时他已经是蒲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



蒲圻市长江忠兴、驻京办主任魏华明陪同民政部区划地名司领导考察赤壁古战场

主任。数年间，他向市长李德贤及后续领导一再提出更名建议，本地文化名人陈天生、作家余玮也向市委、市政府提出类似建议。

在启动更名之前，还有过一段插曲。1992年，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到蒲圻赤壁古战场考察，对这里是否为真正的赤壁之战遗址表达疑虑。作为随同讲解专家，冯金平从历史、地理、出土文物、军事、气象等方面一一从容作出回应，打动了韩克华。韩局长当场拍板拨款300万元，开发赤壁古战场旅游区，修建赤壁文物陈列馆。

1995年，蒲圻市委主要领导决定烧起“三把火”：一是筹建火电厂，二是蒲圻火车站迁址重建，三是申请将蒲圻更名为赤壁。城市更名，其原因有很多。启动“蒲圻”更名“赤壁”，最主要的原因是依托城市更名，扩大城市知名度，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渠道。

1995年，我从市地方志办公室接过地名业务工作，筹建市民政局地名管理股。当

时我对地名知识了解较为肤浅，在为市政府代拟起草的《更名请示报告》中，更名理由填写的是“为了提高城市知名度、发展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更名请示报告》由市政府上报咸宁地区行署，地区行署又上报省政府，同时抄送省民政厅。经过逐级沟通汇报、审批，1996年，省政府签署的公文总算上报到民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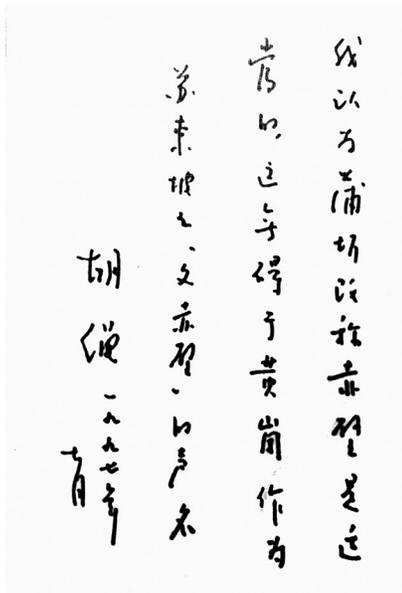
等待数月，没有音讯。

1997年，市民政局局长覃金和、市政府驻京办事处

主任魏华明等，赶赴民政部区划地名司进一步汇报沟通，这才明白《更名请示报告》被搁置的原因。区划地名司负责人表示，根据《地名管理条例》，诸如“为了提高城市知名度”“发展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等，都不能成为城市更名的理由。蒲圻市委、市政府又紧急抽调冯金平作为专家顾问，委托其充分研究地名管理政策，重新代拟《更名请示报告》。

在更名最为关键的时刻，冯金平不仅作了学术研究和舆论宣传的大量准备工作，而且直接进京参与筹划和汇报。冯金平在撰写的报告中提出：赤壁是饮誉中外的三国古战场，在唐代与岳阳、武昌并称江南三大商阜，这一著名古迹却因其所在地的蒲圻二字生僻，长期影响它的开放开发。为了维护国家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赤壁古战场的保护、开发、建设，故决定报请批准将市名更为赤壁。

这个时期我担任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对蒲圻更名赤壁的批示

先后三次跟随市领导赴民政部沟通汇报，推进更名工作。本已万事俱备，只欠走流程批复，可是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经过慎重研究，对蒲圻更名事宜还是有些犹豫。他们认为，尽管学术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赤壁之战发生在蒲圻，但仍缺少一位权威人士的佐证。

1997年7月，蒲圻市有关领导找到北京301医院，请求在此住院休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历史学家胡绳给予一个公正的认定。一贯反对“把地名改来改去”的胡绳，面对蒲圻市更名赤壁市一事，郑重写下“我认为蒲圻改称赤壁是适宜的，这无碍于黄冈作为苏东坡之‘文赤壁’的声名”批示，表明他支持蒲圻更名赤壁的鲜明态度。

1998年5月，蒲圻市举办第二届三国赤壁文化旅游节预热活动。借此机会，市委、市政府邀请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派员到蒲圻考察调研。区划地名司安排一位资深处长莅临蒲圻，算是对蒲圻“更名工程”最后的现场审核。

1998年6月11日，民政部以“民

行批[1998]22号”文件复函湖北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蒲圻市更名为赤壁市。经省政府、地区行署等层层批复，1998年10月16日，蒲圻更名赤壁新闻发布会在武汉洪山礼堂举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17家央媒及诸多地方媒体参加。

10月18日，刚经历百年未遇大洪水考验的赤壁市举行盛大仪式，更名后的赤壁市委、市政府正式挂牌。全市各乡镇、办事处、市直单位也纷纷启用新的名称，改换招牌和印鉴。全市上下改头换面，以全新的面貌迈进“赤壁时代”。

一个“更名最成功的城市之一”

1998年，在批准蒲圻市更名的同时，国务院批准投资37亿元的蒲圻火电厂项目也开工建设。当年7月，投资1.1亿元的赤壁新火车站动工，5年后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多位史学界资深教授在得知蒲圻更名赤壁的新闻后，第一时间给我父亲冯金平打电话表示慰问和祝贺，认为“蒲圻市更名赤壁，冯金平功不可没！”有人说，冯金平是赤壁市的“活字典”，所有关于赤壁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只要问他，没有他不知道的。《毛泽东选集》再版修订时，《毛选》编委会曾特致函给他，请他专门为毛泽东著作中的“赤壁之战”作新注释。中国邮政总局设计发行《三国演义》中有关“赤壁”系列纪念邮票时，也特邀他为邮票邮折撰文。

名称是软实力，一个城市的名称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这座城市的发展。如今城市更名现象层出不穷，甚至一度上升为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对于蒲圻更名赤壁，全市

上下普遍认为，赤壁的知名度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拥有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改市名是本市发展的需要，是顺应历史、合乎民意和现实的选择。当然，仍有部分市民觉得从情感上一时难以接受，毕竟“蒲圻”这个名称是祖祖辈辈的记忆。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蒲圻”同样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弃之实在可惜。温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赤壁之战研究》作者张靖龙对“蒲圻”一名的逐渐失落表示惋惜。他称：“历史上地名更替繁多，在全国，都找不到几个能在一千多年里一以贯之的县、市名，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了保留“蒲圻”基因，赤壁市政府经报请省民政厅批准，将老城区的“蕤川街道办事处”更名为“蒲圻街道办事处”。

当然，蒲圻更名赤壁后，更重要的是机遇多多，红利满满，其知名度、美誉度有明显提升，甚至一步到位迈入国际视野。更名后的某年，赤壁市市长跟随上级咸宁市市长出访欧洲国家。当地官员似乎只知道中国赤壁，而不知道咸宁，对赤壁市长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弄得二位领导尴尬不已。

成君忆，是中国管理文学开创者，他在日本、韩国等地交流讲学时，受到热烈追捧。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一本《水煮三国》而名扬海内外，另一方面是他的自我介绍非常吸引人。成君忆说，他来自赤壁，赤壁之战的赤壁。赤壁市以“三国赤壁文化”独具优势，逐渐打造了一张具有国际价值的名片。这张名片，必将迎来更多海内外宾客对赤壁刮目相看。

蒲圻更名赤壁后，发展迅速，综合实



蒲圻市更名赤壁市挂牌仪式

力明显增强，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赤壁古战场成为5A景区，2023年全市接待游客1665.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23.35亿元。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0亿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5亿元，其中地方税收收入18.3亿元。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地方更改过名字。有的地方改名后，新地名并不如老地名响亮，甚至缺少文化内涵。当然也有城市改名前默默无闻，改名后天下皆知。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蒲圻县一直显得默默无闻，新中国成立后，蒲圻和邻县咸宁还曾短暂合并，随后两地又分开。蒲圻更名为赤壁后，从默默无闻到四海皆知，完成了自身的蝶变。

冯晓光，赤壁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我与武汉杂技团共成长

◇ 梅月洲

人物名片：梅月洲，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省杂技家协会主席，市政协委员，武汉杂技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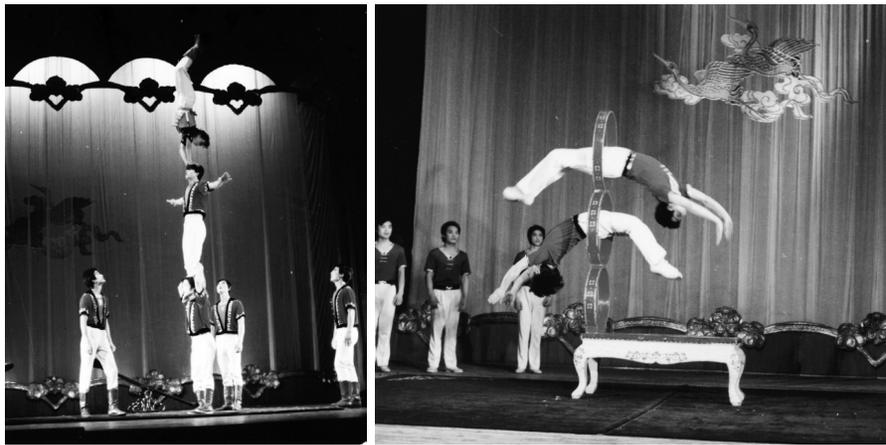
我是一名杂技演员，1979年进入武汉杂技团至今，经历了舞台上下摸爬滚打的磨练，也经历了在国内外演出市场和赛场的竞技献艺，从一名普通的杂技演员成长为杂技艺术工作的管理者。

45年的艺术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文艺工作者，无论是身为演员还是身在领导岗位，都要心怀爱国为民之心，要有为国争光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与担当。

走法访德，以杂技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武汉杂技团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夏菊花为代表的几代杂技表演艺术家共同努力下，一步步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杂技艺术表演团体，是当年全国五大杂技团之一。13岁那年，我被武汉杂技团挑选为学员，作为团里第四代学员培养，开始了我的杂技人生。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1987年武汉杂技团赴荷兰、比利时商演。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第一次向欧洲派出的商业性演出团体，也是夏菊花担任市文化局局



梅月洲表演《大跳板》《钻圈》

长后的第一次率团出访。我有幸作为武汉杂技团新生一代(第四代)年轻演员随团出访。此次出访演出的节目有《柔术顶碗》和《椅子造型》两个国际金奖节目,还有《跳板》《双蹬人》等国内获奖节目,以及《钻圈》《双扛杆》《双层定车》《双蹬技》《狮子舞》《集体车技》等十多个优秀传统节目。

这次商演在荷兰、比利时引起极大的反响,每场演出都引起观众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惊叹声、喝彩声。他们对于中国杂技的表演形式和高难技巧赞不绝口:“你们的表演堪称人类的骄傲”,“真是漂亮、完美的艺术”。媒体也用各种词汇来描述:“演出的热烈气氛是任何西方马戏团所不能比拟的”,“《椅子造型》展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合作、奋发向上和向困难挑战的无畏精神”。一家报社还以《在中国,杂技是艺术》为题,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对杂技的重视。

另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在1989年,武汉杂技团“用艺术征服巴黎”的访法演出。当年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东欧发生剧变,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无理诋毁、制裁,我国一般都不派大型文艺团体到欧美演出。由于法国演出商坚持邀请武汉杂技团按合同如期

访法,中演公司经文化部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同意武汉杂技团到法国演出。

夏菊花团长在文化部领命时,部领导向她特别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批准武汉杂技团赴法演出,这是第一家,是党中央对你们的高度信任,

一定要进行严格政审,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外事纪律教育,艺术、作风都要好,要做到绝对安全,万无一失,政治上不出问题。文化部外联局领导甚至要求夏菊花写下保证书,保证人员安全。

巴黎号称世界艺术之都,每天约有130多种演出,其中不乏世界知名的表演团体。我们的演出地点,安排在法国“明日”国际杂技马戏节的比赛场馆——冬季马戏场。要在冬季马戏场连续演出两个多月,赢得观众并不容易。

首演阶段,上座率不足50%,但冷清的剧场被法国人天性率真的热情点燃,他们对每一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随着一场接一场演出的正常进行,武汉杂技的精湛技艺也一天天在巴黎市民中口口相传。排队买票和提前订票的观众日益增多,上座率逐日上升,终于使冬季马戏场沸腾起来,连连爆满,以致台阶、走道和乐队席周围都挤满了观众。

当身着玫瑰红服装的女演员表演《转碟》,当小伙子们在《钻圈》中鱼跃腾越,当别开生面的《柔术顶碗》做出一个个高难动作,当七名演员完成斜塔式的《椅子造型》……每一个精彩动作结束或每一个节目



1987年6月，夏菊花率团赴荷兰商演

成功之时，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一个节目赢得24次掌声，有一场演出鼓掌达200多次。尤其是青年学生场气氛更为热烈，掌声、呐喊声、口哨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观众们的疯狂气氛，搅热了冬季马戏场。

驻法大使周觉观看演出后，高兴地对演员们说：“今天我不仅欣赏了你们的艺术，也分享了法国人民的友谊和热情掌声。你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帮助使馆开展了文化外交，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当我们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回国时，文化部发出《关于表彰武汉杂技团的通知》，特予表扬。一次商业性出访演出，受

到文化部通报表彰，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与此同时，市政府也给予武汉杂技团表彰和奖励。

1993年，武汉杂技团先后两次完成出访德国的商演任务。第一次是3月至9月，受中演公司派遣赴德国进行为期半年的商业性巡演，历时195天，演出302场，观众38万

人次，创汇53万美元。第二次是12月至次年3月，由武汉市自主联系出国商演，在瑞士、德国进行历时105天的巡演，演出130场，观众10余万人次，收入24万余美元。

这两次以中国国家马戏团名义进行的演出，都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和媒体高度好评，舆论广泛称赞。在柏林的演出从6月初到8月底，大篷扎了足有三个月，演出135场，激起一次踊跃观看中国杂技的热潮。大篷外频现观众买不到票而不愿离去的场景，大篷内多次出现走道中间加座的爆满场面。

德方不得不三次延长演出日程，并在媒体宣传和海报上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延



1989年10月赴法国演出



1993年赴德国演出

长”。德方宣称，中国马戏团在柏林成功的演出创下了两个纪录：在一个城市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观众人数最多，柏林有17万人次观看演出。

中国杂技是一种能够跨越国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国际艺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武汉杂技团作为中国杂技界和武汉文艺界的一支大团、名团，正是在一次次完成国家委派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以鲜明的民族风格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为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的艺术团体。

与时俱进，带动杂技艺术创新发展

杂技的“技”是各种各样的技巧，而“艺”是现代艺术发展后产生的综合体现。每一个剧种有它的核心。杂技现在虽然把很多舞蹈表演的元素也融合过来了，但我认为它的核心是不变的，技巧是我们永远要追求的东西，技巧的难度永远是灵魂。

随着时代发展，杂技自身技巧的发展也遇到诸多瓶颈，而且多种艺术形式的运用、嫁接我们也都尝试过了，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人民群众对于现代艺术的需求，特别是如何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结合，这就是未来的发展走势。

创新是艺术的内在要求，杂技艺术尤其如此。武汉杂技团的节目以2000年为分界

点：之前主要强调的是单一节目的创新，即凭借技巧难度和舞美设计，来满足人民群众求新求异的消费需求；2000年后，开始注重主题杂技晚会的打造，强调的是晚会的整体氛围和效果。

这期间，在省、市领导的支持下，我组织武汉杂技团先后排演了《英雄天地间》《海盗》《梦幻九歌》等大型杂技剧，以强烈的楚文化色彩、大开大合的气概、幽隐曲折的抒情、惊艳绝美的表演，吸引国内外观众。

2003年武汉杂技团建团50周年之际，我们编排了一台符合国际杂技演出潮流的庆典晚会《英雄天地间》，这也是武汉杂技团新世纪以来首台大型主题杂技晚会。整台晚会以歌颂中华民族三千年英雄奋斗历史为主线，以杂技节目为载体，演绎出一曲曲史诗般的英雄赞歌。



武汉杂技团表演节目《英雄天地间》



2009年省委书记罗清泉观看《梦幻九歌》

当年,《英雄天地间》即与荷兰星辰公司签下2004年赴欧洲巡回商演7个月220场的大单。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剧组再赴欧洲前接见全团,盛赞:“《英雄天地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民族特色征服了外国观众,你们让欧洲几十万人感受到中国人的智慧和真善美的追求,功不可没。”

《英雄天地间》的成功实践,为武汉杂技团在新世纪杂技剧节目的创造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时期,我升为副团长,在参与《英雄天地间》的综合艺术创作,实施艺术生产管理及国际巡演等方面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得到了锻炼。

紧跟时代,开启武汉杂技新征程

2012年,根据市政府文艺体制改革方案,武汉杂技艺术发展中心转企改制为武汉杂技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兼团长,2020年起任党委书记。我深感自己肩负的担子重、责任大,唯有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爱岗敬业的事业心,才能履好职尽好责。

改制只是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解决今后人才发展和艺术发展的问題。艺术发展要有经济收益做支撑。政府财政支持是基础,基本保障演员待遇和公司日常运行,我们自己也要到市场上去争取拼搏,才能够持续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市场再积累、再发展,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团杂技基础与市场“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应该说成绩斐然。

新时代以来,武汉杂技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演出为中心环节,健全院团转企改制制度建设,坚持守正创新、开拓演出市场,坚持以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根本,不断拓展现实题材和重大题材杂技剧的创作思路。

我们创作排演了以平民英雄为主角,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杂技剧《英雄之城》;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武汉城市发展变迁的原创杂技剧《江城》;复排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大型项目杂技秀《梦幻九歌》,宣传展示历史悠久的楚文化;推出融合大型魔术、马戏驯兽、滑稽小丑、激光表演驻场演出剧目《秘境奇光》;与迪士尼联合创作驻场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舞台剧《人猿泰山·丛林的呼唤》等一批优秀剧目,广受好评。

2024年,围绕长江文化、荆楚文化主题创排光影幻景杂技剧《凤凰说》,以中华文明标志性图腾之一“凤凰”作为剧目主体,以“技·艺”融合的创新呈现方式,以极具荆楚地域特色的“大江”“大泽”作为呈现空间,用杂技语汇创造性演绎长江文化源头故事,传承弘扬长江文化。该剧自6月首演,已完成100场驻场演出。

武汉杂技从古老的技艺发展过来,在艺术形式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影响力,一方面保留传统的杂技内涵、精华,另一方面朝未来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武汉杂技的价值。现在武汉杂技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我们就更要努力把这个传承下去,让武汉杂技能够永远保持艺术青春,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武汉大桥工程局首任局长彭敏

◇ 王 钢

彭敏是铁道兵的创始人和中国铁路桥梁建设的开拓者之一，也是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第一任局长，有党内“红色专家”之誉。这位一生造桥铺路的传奇人物，胸怀赤子报国之心，铸就不凡路桥人生。

投身学潮和抗日斗争

彭敏（1918—2000），原名周镇宇，江苏徐州人。学生时期，就读于江苏扬州中学土木工程专业，为日后从事路桥建设打下基础。因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在扬州中学组织学潮，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之后进入上海正风中学学习美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上海中学学联活动，组织学生纪念九一八事变。不久赴北平，加入中



彭敏

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并组织爱国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前，彭敏受党组织派遣，到太原参与山西总工会筹建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北方局和山西省委组织下，成立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彭敏任该队的宣传队长、民运科长。1938年夏，山西文水县抗日政府组建，彭敏历任文水县政府秘书、特殊党支部书记、县游击队队长。1939年8月，彭敏又任新整编的山西新军工人自卫旅22团3营营长，不久升任22团团长。面对日军在山西的疯狂扫荡，彭敏率领部队参加反扫荡战斗，屡立战功。这个在城市长大的青年学生，在严酷的抗日斗争中磨砺成长起来。1940年11月，彭敏由党组织派往延安学习军事政治。

率领铁道兵随军转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彭敏从延安派往东北，从此和铁路桥梁建设结下不解之缘。1945年12月，北安铁路局成立，彭敏任副局长兼北安铁路公安护路军副司令员。1946年6月，北安铁路局迁至绥化，改称绥化铁路分局，彭敏任局长兼绥佳铁路公安护路队司令员。12月，绥化铁路分局并入哈尔滨铁路分局，组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彭敏为副局长兼电力部部长。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彭敏指挥了北满铁路的抢修维护工作，并率护路军武装保护铁路交通安全。

1948年7月，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彭敏任铁道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铁道纵队这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在战火硝烟中催生并迅速壮大起来，彭敏的才华也得到充分发挥。8月至10月，他指挥第三支队历经艰辛修复的松花江铁路大桥，被东北局副局长陈云称之“为东北人民修通了一条胜利之路”。这段令人难忘的铁路桥梁抢

修经历，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影响深远。

松花江大桥的抢修，得到苏联桥梁专家的指导，其中苏联专家西林与彭敏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他俩的跨国友谊，在数年之后结下更为丰硕的果实——举世瞩目的武汉长江大桥。

“部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这是铁道兵最响亮的行动口号。彭敏指挥抢修哈长铁路，又马不停蹄向关内进发，修复津浦铁路和淮河大桥。当年三支队广播宣传员王则石事后回忆说：“彭敏同志当时是三支队支队长，铁道纵队成立的时间不久，他的名字就很响亮、很有影响，在中层干部中是很突出的。他的特点是带着工程技术人员、参谋人员在施工现场，随时决策，干脆果断。普通的战士、干部、工人都怕他，生怕做得不好让他看见。他对于重大桥梁的抢修很有能力，兵力如何布置，如何指挥施工等等……”

1949年5月，铁道纵队扩编为铁道兵团，彭敏任铁道兵团工程部部长兼第三支队支队长。为配合野战军追歼残敌，彭敏率部西进抢修陇海铁路洛河大桥。在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又抢修衡阳湘江大桥及湘桂铁路等。彭敏带领部队一路跟随解放战争的号角，从冰冻千里的北方转战江河纵横的江南，确保了战时铁路和桥梁的畅通无阻，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事业立下大功。

1950年7月，铁道兵团下达整编命令，彭敏任总部工程部部长兼总工程师。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1月中央军委命令铁道兵团入朝执行铁路保障任务。彭敏临危受命，率铁道兵团1师紧急出征，抢修朝鲜铁路桥梁，并任中朝联合军运司令部抢

修局副局长、前方抢修指挥所司令员和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三副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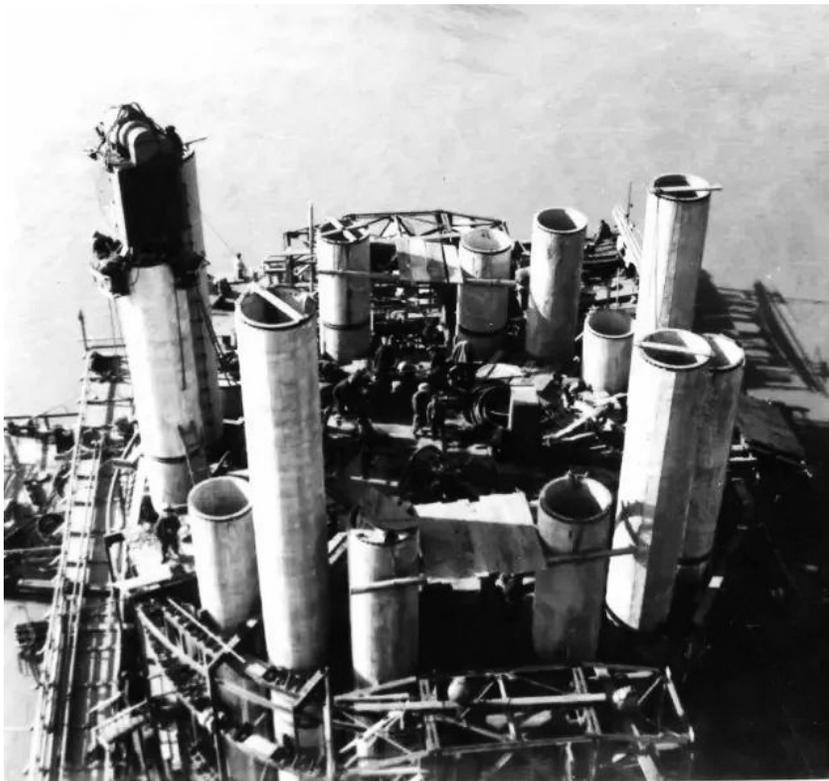
彭敏坚持“部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尽快把铁路抢修到志愿军的前方阵地。在彭敏的指挥下，英勇的铁道兵团不畏美军的狂轰滥炸，用钢铁般的双臂筑成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运输线，用血肉之躯换来交通动脉的安全顺畅，有力保障了中朝作战部队的物资供给，为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就连美军也不得不承认：“在差不多一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飞机一直在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系统，在北朝鲜仍有火车在行驶……坦白地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设铁路的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

1952年初夏，彭敏负伤从朝鲜回国，在北京治疗期间被委以重任——修建武汉长江大桥。

万里长江江面宽阔，水深流急，长期阻隔南北交通，乃至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在武汉被长江一分为二。近代以来，武汉长江建桥规划多次，但受地质复杂、技术力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均成纸上空谈。

新中国百废待兴，仍将武汉长江大桥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1953年4月1日，铁道部铁路工程总局武汉大桥工程



武汉长江大桥大型管柱施工现场

局成立(1958年3月改名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简称大桥局)。

1954年1月，政务院通过《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任命彭敏为大桥局首任局长。历经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抢修铁路桥梁的锤炼，彭敏对一般桥梁建设已驾轻就熟，但兴建武汉长江大桥这一宏大工程，对他来说仍是一个巨大挑战。

彭敏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投身到大桥建设中。铁道部聘请以西林为组长的28人苏联专家组，同时成立以茅以升为主任委员，委员包括罗英、陶述曾、李国豪、张维、梁思成等各方面专家的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智囊团，为万里长江第一桥建设保驾护航。

桥梁基础结构施工是大桥建设的关键，最初设计采用桥梁建设惯用的“气压沉箱法”。这种施工技术需要工人到深水高压空

气沉箱内操作，不仅效率低、工期长，而且施工风险大，加之水深流急、地质复杂，难以解决深水施工的难题。西林提议改用“管柱钻孔法”，即将空心钢筋混凝土管柱打入河床岩面，在岩面上钻孔并灌注混凝土，用混凝土与钢筋笼将岩孔和管柱连接起来，形成基础的结构，再在上面修筑桥墩。该方法较气压沉箱法不受水位限制，更易于操作，安全性更高，属世界首创，即使苏联也未实施过。这一大胆设想，引起国内外专家的激烈争论。

彭敏和西林早就并肩战斗在松花江桥梁工地上，1949年夏又为修复陇海铁路洛河大桥一起共事，结下深厚友谊。彭敏专业知识扎实，判断和决策能力强，面对施工方案的巨大分歧，经过缜密思考，认为老朋友西林提出的管柱钻孔法有其优越性，提出“一切通过试验”的主张，通过试验来证明其可行性。

1954年10月至1955年6月，在彭敏的支持下，西林与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对管柱钻孔法每一道工序实地试验，从预制管柱、下沉、钻孔、清碴，到水下混凝土封孔、钻取岩芯试压，经过无数次失败与改进，最终验证新方法是科学可行的。这一期间，彭敏顶住巨大压力，冒着风险坚持试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也全力支持，使新施工方法得以顺利推进。

1955年7月，国务院批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标志着大桥进入施工阶段。9月，江中桥墩开始采用管柱钻孔法施工（其中7号墩地质特殊，

用管桩深基础施工）。12月，苏联政府特派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技术总局副局长葛洛克洛夫、桥梁工程总局总工程师金果连珂和基础基底专家沙格洛夫教授，来到大桥工地考察验证新的施工方案，肯定了管柱钻孔法。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大桥施工工地，在听取彭敏关于建桥新施工方法的汇报后，高兴地说：“管柱钻孔法本是苏联工程师发明的，可他们不敢用，我们用了，证明了是成功的！”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彭敏与中外桥梁专家密切配合，在设计、施工方面都表现了高度的创造性。大桥采用管柱钻孔法建成的管柱结构基础、钢梁制造所达到的高度精确性以及伸臂安装法的运用，都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技术水平。由于采用管柱钻孔法，各桥墩工序又是流水作业，施工进度十分迅速。1957年3月桥墩工程浇注完工，5月大桥钢梁顺利合龙，9月全部完工，10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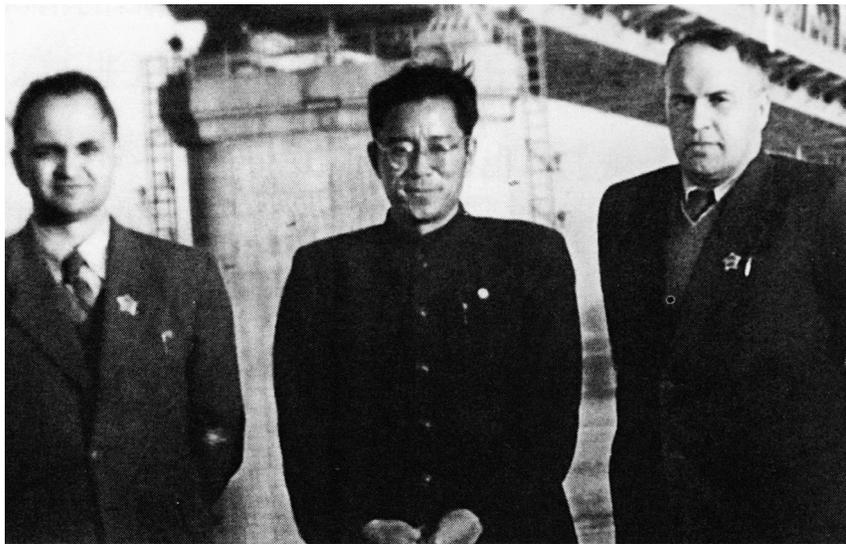
1957年10月14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左四）及彭敏（左二）陪同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率领的代表团参观武汉长江大桥

1955年7月建桥之初，彭敏即明言：“我们要给人民修建一座质量好、造价低廉的桥，同时也要以更快的速度争取提前完工，并完成培养我们自己以及培养更多的桥梁建设人才，为祖国修建更多的桥梁奠定基础。”

仅仅两年零一个月时间，大桥即告竣工。这是时代的奇迹，在中国桥梁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彭敏相信科学，

坚持“依靠群众，一切通过试验”的原则，在实践中敢于创新，狠抓质量，为大桥建设竭尽全力。他所倡导的“尊重科学，勇于实践，技术创新，严格质量”的大桥精神，成为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延绵至今，发扬光大。

彭敏领导刚成立的大桥局不辱使命，实现了中国人民“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但他并不居功自傲。1957年10月15日大桥通车这天，他在《长江日报》发表《党的领导，人民的力量》一文，总结



1957年10月，彭敏（中）与苏联专家西林（左）、葛洛克洛夫（右）在长江大桥下合影留念

长江大桥胜利建成的原因：“武汉长江大桥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人们克服困难的斗争，终于建成了。从正式开工到建成，仅仅只花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是什么力量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党的领导！是人民的力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对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彭敏也表示衷心的感谢：“苏联党和政府派来的专家的技术援助，在长江大桥建设工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以西林同志为首的专家工作组提出了并共同实现了新的管柱

钻孔法，在钢梁设计、制造和安装，新机具的设计和制造，在每一个技术性的关键问题上都有极宝贵的建议；而且和我们研究解决了施工中的一切技术问题，共同尝受工程的艰难困苦，以他们的知识无保留贡献给我们的建设事



1957年10月15日，《长江日报》刊发彭敏文章

业。”可以说，武汉长江大桥是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结晶。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用于试验的大型管柱仅存汉阳莲花湖畔的一根。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嘱托下，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武汉铁路局将这根管柱制成一座圆柱状纪念碑，碑身刻有“五米大型管柱试验实物纪念”大字，碑座镌有彭敏所撰《管柱钻孔法试验记》。彭敏在碑文中道出立碑缘由：

“纪念这一世界桥梁技术上的新创造，纪念群众的智慧和劳动，纪念征服长江的雄心壮志，纪念中苏技术合作的光辉范例，纪念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中苏人民的深厚友谊。”而在长江对岸的武昌桥头观景平台上，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也是以大型管柱为原型设计建造的，彼此遥相辉映。

在武昌桥头南侧，还有一块彭敏手书



以大型管柱为原型设计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

的“蛇山头”摩崖石刻。因修建武昌引桥的需要，蛇山西端的山石挖除铲平，永远改变了蛇山的地形地貌。为使后人记住蛇山的原有肌理，在引桥处保留下一块山石。该处原为蛇山山头，是临江最高点，遂在山石上凿刻“蛇山头”三字行书，行笔流畅，富有韵味。“蛇山头”摩崖石刻虽然面积不大，但价值并不一般，不仅具有永久性蛇山地标的意义，也留下一处彭敏不可多得的手迹。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桥梁建设的第一座里程碑。彭敏认为：“长江大桥设计和施工的过程，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长江大桥是我们的一所桥梁工程学校。所以长江大桥的技术总结，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三年来技术学习的总结。这是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劳动的综合，也是中苏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职工群众劳动的成果。”

为将建桥技术与经验传之于世，彭敏组织大桥局编撰《武汉长江大桥（技术总结）》，1958年9月出版。

修建南京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拉开了中国现代化桥梁建设的序幕，彭敏信心满怀：“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了，它结束了在长江上没有桥的历史，也是长江上有更多桥梁的开端。”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铁道部决定由大桥局在南京、芜湖、宜都同时修建三座跨江大桥。彭敏接受任务后，相应组建了三个大桥设计组。他带领设计人员沿江勘察桥址，绘制南京大桥草图，并动员全国科技力量献计献策，所有问题都摊开讨论。桥梁专家李国豪有感而发：“大桥工程局的局长彭敏，他采取了很开明的做法：邀请国内几个与桥梁有关的科研单位和高等



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全线通车

学校，共同编制南京大桥设计方案，组织专家对此方案和大桥局的设计方案一起进行评比。参加评比单位的负责人和专家都感到获益不少，经过反复比较、论证，最后大家认为还是大桥局的方案可行，即一致推荐了这方案。”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一项议程就是讨论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彭敏在会上汇报了设计方案的详细内容和具体实施意见，得到中央的肯定。

1959年11月，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部成立，彭敏任总指挥。同年，大桥局党委直属江苏省委领导，彭敏任大桥局党委书记。

1960年1月，南京长江大桥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其特有地势、地质条件和通航要求，带来工程的艰巨性。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彭敏只有一个信念：国家需要这座桥，

越早越好！但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关键时期，彭敏调任铁道部基建总局局长，主持全国铁路包括桥梁的基本建设，不久又调到成昆铁路指挥部工作。

南京长江大桥受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影响，投资锐减，物资供应紧缺，一度被迫停工。彭敏虽离开建桥施工第一线，仍然牵挂大桥建设。在江苏省委的建议下，中央又将彭敏从成昆铁路工地调回南京，处理解决建设难题。彭敏与江苏省委领导将大桥建设方案上报中央，得到国家的专款批准。

1965年冬，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复工。1966年上半年，资金和材料又出现短缺，停工还是续建，面临艰难抉择。已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彭敏将情况上报中央，得到周恩来总理“不停工”的批示。1967年8月，大桥钢梁架设胜利合龙，主体工程大体完工。

1968年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铁

路桥先行通车。12月29日，公路桥竣工通车。南京长江大桥的全线贯通，开创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设计建造大型桥梁的新纪元，成为继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1959年建成通车）之后第三座跨越长江的大桥，在中国桥梁建设史上又竖立起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构筑西南铁路大动脉

在大桥工程局工作期间，彭敏领导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湖南湘江大桥、广州珠江大桥及南京长江大桥等诸多大型桥梁；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师和工程组织者，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建桥队伍；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桥梁学院——武汉桥梁工程学院（1958年成立，1964年撤销）并任院长，为新中国桥梁事业造就大量优秀人才，为大桥工程局的发展及新中国桥梁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1963年4月，中央一纸调令，彭敏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64年8月，党中央制定加快“三线”经济建设的国防建设战略决策，展开为“三线”建设服务的西南铁路大会战。9月，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成立，彭敏任副总指挥兼总工程师，负责全面技术工作。

大西南地势险峻，峡谷密布，地质灾害频繁。铁路设计难度之大、工程之艰巨、施工之复杂，前所未有。数十万大军劈山架桥，在崇山峻岭间筑起一道钢铁大动脉。彭敏参与领导了成昆铁路、川黔铁路、滇黔铁路、桂昆铁路的建设。特别是修筑成昆铁路和桂昆铁路时，他采用40项新技术及隧道快速施工法，审定改进多处线路走向方案，主持制定《西南铁路设计革命三十条》，得

到充分肯定和推广。成昆铁路的建成，谱写了中国铁路史上的壮丽篇章，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毛泽东主席特为成昆铁路题词：“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1970年彭敏任交通部副部长，1971年派赴非洲坦桑尼亚、赞比亚指导坦赞铁路建设，解决了工程受阻的难题。1973年任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兼港口办主任，为落实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指示，主抓港口建设，再立新功。1975年后在国家建委、经委和计委任领导工作，1985年12月离休。

2000年3月6日，彭敏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彭敏的老战友、湖北省老领导李尔重手书祭文，字里行间饱含深厚感情，给予高度评价：“彭敏同志我的好战友，人民的好儿子，数十年如一日，为社会主义大业奉献了一生。你淳朴敦厚，不捧上，不压下，不浮夸，不自誉，踏踏实实干事情。你有一颗忠诚老实的心，有一双用科学技术武装了的手，有一对稳如泰山的脚根。西风吹不迷航，浊浪扬保洁白，淡泊自如，平实伟大。”

王钢，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市地方志专家库专家

清末民初武汉商界大亨吕超伯补传

◇ 张胜林

吕超伯（字逵先），武汉各种各类志书中有四种言及，但《武汉市志·人物志》未列专条。吕氏人物专条列传者，一是辛亥革命先驱吕大森，一是舍己救人的少年英雄吕锡三，两人都理所应当。那么吕超伯该不该呢？还是看看历史文献资料，看看吕超伯生平履历。

官商两界头面人物

吕超伯曾任湖北官钱局总理。

《神州日报》1912年5月10日《鄂省最近经济谈》报道：“湖北官钱局已委任前

商会总理吕超伯为总理，前日到差。”表明吕超伯在民国元年5月8日即担任湖北官钱局总理一职。同年《亚细亚日报》6月2日有一篇《鄂省金融大恐慌》重要报道，说到由于革命和动荡，纸币市面流通大受影响，商家和钱店大多只认金属货币。

我们知道，湖北官钱局创办于张之洞督鄂之时，发行纸钞两种即银元票和铜元票，在较长时间内，纸钞与银元铜币兑换率稳定，故纸钞坚挺。但辛亥革命后，多省不认纸钞，新政权为了筹措巨额军费又大量滥发纸钞，于是湖北官钱局的纸钞信用大幅下跌，商家不开门以此拒收纸钞。

当此关头，作为官钱局总办的吕超伯要力挽狂澜于既倒，“日前官钱局总办吕超伯设法维持，特嘱武汉各钱店代收纸币，以六钱三分二零收、三分七厘汇局照兑，以期纸币流通、金融活动”。这个办法是割自己肉补他人疮，即鼓励钱店用0.632两收取纸币1元（纸币稳定时，1元当银元大致1元，折合白银0.72—0.73两之间），钱店汇到官钱局实际得银六钱三分七厘即0.637两，钱店从中牟利0.3%。但纸钞一下子收得太多，并没有用于市面而是都去官钱局兑换现银，“行之一日，拥挤杂沓（原文沓，误），应接不暇，已收至五百余万之多，为数太钜，亏欠不资。”这个亏本的“买卖”做不下去了。显然，吕总办这一招没能解决问题。

吕超伯此举虽然失败，但证实了他作为官钱局总办的身份不虚。总办又名总理，是民国初年非常重要的职务。这样的一个重要职务的担任人，不能在《武汉市志·人物志》专条列传，未免说不过去。

吕超伯长期任鄂武暨全国商会负责人。

1908年，吕氏即任武昌商会协理。《汉口中西报》1908年9月4日《黄太守筹办大宗赈米》报道，武昌府太守（知府）黄霖“邀同商务协理吕超伯司马、唐介夫司马等莅劝业场筹办黄州水灾冬赈办米平糶事。先拟赴湘采办米石，恐该省闻风提价，况道远难救近荒，决议在武汉陆续采办十三万石，九十月运往黄属放赈”。这是笔者见到的吕超伯清末首次见于报端的内容。此年他已为武昌商会协理，也就是副会长，推测是当家的副会长，因为知府找他商量而不是找会长。也正因为已然是当家的副会长，所以他次年就当会长。

1909年，吕超伯在选举中胜出，任武昌商会总理。《神州日报》1909年3月4日《武

昌商务总会选举会纪实》报道，武昌商会换届选举，“开票宣示……吕超伯二十一票，殷友于十五票，唐介夫三票，李采青一票（另有四人均一票），统计票数吕君最多，举为总理，殷君次之，举为协理。”这是吕超伯首次担任一个重要城市商会的会长，而老会长李采青仅得一票。

次年即1910年1月29日《汉口见闻录》载《调查录 武昌商务总会新举宣统二年各帮商董》，共列商帮二十家，首位即列“典帮二人吕超伯朱子芸”，可见吕氏不仅是武昌商会会长，又是武昌典当行行首。

《益世报》1918年3月26日报道：“吕超伯回鄂，昨偕武昌商会会长殷友于晋謁王督要求和平解决时局。”王督，指湖北督军王占元，所谓解决时局指军阀混战。吕超伯在武昌商界领袖武昌商会会长的陪同下，去见湖北最高军政长官要求和平。

《益世报》此前23日《汉口各团体之和平运动》报道，“汉口和团联合会会长王明文等日前致全国商会联合会吕超伯、杨欣甫、赖春霆诸君”，呼吁他们出面干预时政、平息战乱。作为全国商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的吕超伯，三天后即赴武汉参与和平运动，足见他当时社会影响力甚高。

《晨报》1922年11月5日报道：“全国商会联合会，已于本月一日在汉口总商会举行开会。出席者……合计七十五名，湖北占去半数，推湖北全省商务联合会会长吕超伯为主席。”细读报道原意，是吕氏原本为湖北全省商务联合会会长，在11月1日会议上又被推举为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晨报》此报道与1918年《益世报》报道略有牴牾，吕超伯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的时间，到底是1918年还是1922年？窃以为，两者均无误。当时政局不稳，商界团

体领导职务更是时时有变，不排除 1918 年吕氏已任此职，中途有变卸职，1922 年又再任此职。

《晨报》1923 年 4 月 25 日报道，吕超伯再次被推举为湖北全省商会联合会干事。报道称，全国各地均举行收回旅大、抗议日货会议：“汉口商会因外交问题，二十一日午后六时开全体大会，武汉各帮商埠均到会……于是推吕超伯为全省商会联合会干事，蔡辅卿万泽生为副干事，公议定名为湖北全省商界外交后援会。”报道中对干事一职的表述不够准确，所谓干事，实指“湖北全省商界外交后援会干事”，而不是“全省商会联合会干事”。换言之，这个全省商界外交后援会由湖北全省商会联合会推举产生并管辖，彰显了吕超伯在全省商界的“首席”地位。

再看《武汉市志·人物志》，1922 年作为吕超伯副手的蔡辅卿和万泽生都有专条列传，而吕氏则无。那么是否吕超伯仅仅拥有一个空头的商会会长而没有在汉兴办实业呢？答案为否。吕超伯不仅如前所言任过湖北官钱局总办这一实业界要职，且在武汉其他经济领域亦多有建树。

大力兴办实业实体

筹办商务学堂。《汉口中西报》1909 年 4 月 6 日《吕司马筹办商业学堂》报道：“商部咨催鄂省开办商业学堂、经督宪转行迅速筹办一节已见报端，兹闻由劝业道邹元汴观察会同商董吕超伯司马创议一切，以公家房屋均无空余、若择地建筑一时经费难筹，刻闻拟将芝麻岭之善技堂改建以备开办。”由此可见湖北第一座商业学堂开办，由邹元汴和商董吕超伯创议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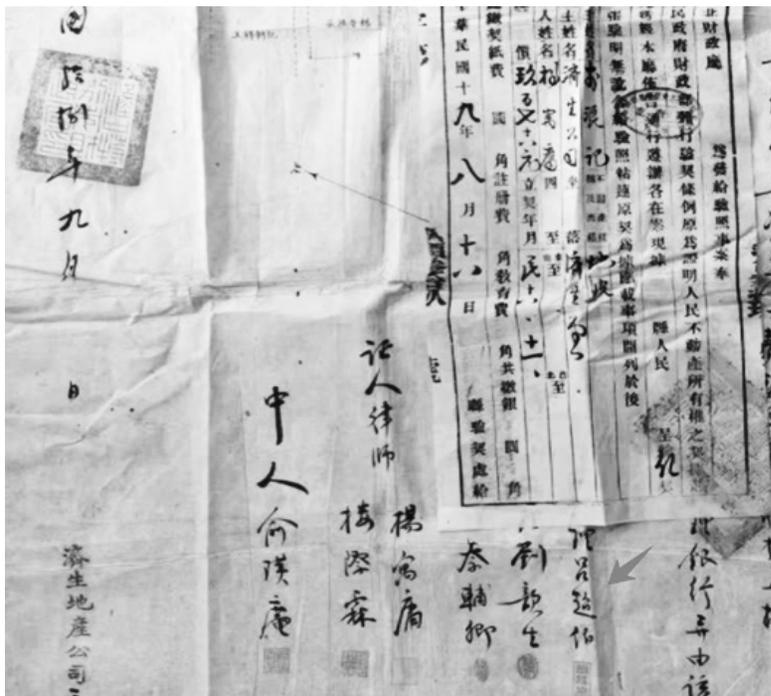


民国地契 武汉江城印象民俗博物馆鄂小华提供

推测实际办理人为吕超伯，因为邹氏身为道台，兼职甚多，难以有充裕时间具体操办一所学堂开办事。

筹办粤汉铁路（北段）。《汉口中西报》1910 年 3 月 30 日报道，湖北省各方领军人物奉命商议筹筑“鄂境铁路”事，其中就有武昌商会吕超伯。虽然只是职务行为，但毕竟江南铁路修筑事，他也是筹办人之一。同报同年 7 月 31 日报道为兴办汉川铁路，武汉三镇发行股票并设“催股员”若干名，其中武昌催股员 13 人，其中又有吕超伯。

兴筑汉江堤防。《时事新报》1921 年 10 月 2 日报道，钟祥汉江王家营堤工兴筑事，湖北省长致吕超伯、蔡辅卿、万泽生、甘鹏云等，要求尽快拿出“该堤工修改及筹款办法”。湖北官钱局总理吕超伯当即专函与其



民国地契 武汉东西湖区收藏家张恒提供

他人商量办法，并表态“前年修王家营之堤，官钱局尚有垫款未还，今则势难再借”，但仍然提出建堤款百万串之渠道来源。

参与创办“汉口伤军（兵）工厂”。《顺天时报》1920年4月20日报道，辛亥革命伤兵生活无着，地方政府鼎力创办伤军工厂。经湖北省“两长”决定，经费六万元先期划拨作为开办费，厂址地皮为桥口（按：民国时期报刊上多用，而“硚口”鲜见）附近劝工院。入厂伤兵第一步学习技艺，第二步生产物品，上有“黎黄陂嘱托”，下有“吕超伯协助亦属不少”。

兴办地产公司。武汉江城印象民俗博物馆、东西湖区收藏家张恒各藏有一份刘歆生卖地契，其落款均有“民生地产公司 总理吕超伯 协理刘歆生”。

上举数事，可见吕超伯在兴办新式学堂、修筑铁路、堤工筹款、开发房地产及创办伤兵工厂等方面均著勋劳，而《武汉市志·人物志》漏载实属不当。

风云变幻中活跃舞台

袁氏复辟时吕超超的表现。《时事新报》1915年9月4日报道，此时袁世凯欲复辟帝制，有“专班”筹安会操办此事，筹安会曾经致电“驻北京代表”吕超伯等人研究。此处驻北京代表是商界代表，不是“复辟”代表。吕氏在袁氏复辟问题上的趋向如何，未知。推测他不一定赞成，因为他的根基在武昌。当时武昌方面借黎元洪旗帜向全国发号召，坚决反对复辟帝制，提出对杨度

等筹安会人“人人得而诛之”。吕超超不太可能与武昌方面公然对抗。

为扩大汉口慈善会筹款。《民国日报》1916年10月14日报道，汉口慈善会扩大规模，广募善款，大总统下令京汉铁路转让土地二千方并善款一万元，其他多方均答应解囊，计九万余元。但是这些善钱大多只是口头上答应，真正收到慈善会账面上，还得有专人去催款，吕超伯是四位“催款代表”之一。这四位都是当时有社会影响之人，地位身份显赫，才能上门催款，才能催到款。

呼吁黎元洪复任总统。《民国日报》1917年7月28日报道，湖北政界首先通电全国，要求黎元洪复归总统大任，商界最高代表全国商会总理吕超伯亦公开呼吁黎大总统复职。

参与汉冶萍“改制”。《神州日报》1920年1月25日报道，湖北省再次开启与汉冶萍交涉事，其中商界巨头四人任交涉代表，吕超伯即为其一。清末汉冶萍煤铁厂矿

公司因为亏损严重，债务沉重，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日资贷款，贷款时附有极严苛的条件。为此，湖北地方政府多次动议交涉，将汉阳铁厂与大冶矿山收归自营。这一交涉事关国家主权，更直接影响中国重工业重中之重的矿业发展前途，事体甚大，故交涉不易。

介入既济水电内部两派之争。《民国日报》1924年6月9日报道，既济水电公司股东两大派纷争，公司总理宋伟（一作纬又作炜）臣辛亥革命时贿赂军方以保存水塔费钱不赀，本人账面上也有几十万做不平。于是湖北地方股东派抬出吕超伯等二人，将宋氏弄下台。

参加哀悼孙中山组织专班。《民国日报》1925年3月23日报道，孙中山逝世后，湖北暨武汉三镇即成立哀悼与纪念专班，军政党学商各界遴员参加专班，吕超伯即为其一。

主持接待“庚款”代表团。《时事新报》1926年报道，英国庚款代表团一行莅汉，英国领事于4月28日举行茶会招待各界名流。教育界代表有陈时、陈雨苍、张怀九、郭复初、章复安、张履鳌、王况君，商界代表有周星棠、吕超伯、郑燮卿、徐荣廷、刘君等。庚款款项规定用于中国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向何时何项目，庚款委员会有决定权，故庚款委员会代表团到地方都是倾力接待，其规格通常超过接待国家最高领导。吕超伯参与此活动，是其商界领袖地位的象征。

主持欢迎宋子文仪式。《申报》1926年12月17日《宋子文招待汉商会》报道：“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晚假座汉口华商总会欢宴武阳夏商界领袖，到吕超伯、徐荣廷、郑慧吾、周允斋、贺衡夫、周星棠、蔡辅卿、王开庭、项仰之、周文轩、吴干丞、

左仁亲等，连各机关各级党部陪宾到八十余人。此为政府迁鄂后官商间第二次正式酬酢，宾主间一席话关系湖北财政前途至为重大。盖先一日商界欢宴各委员，吕超伯沥陈汉口商业实业不能发展之原因，由於军阀专政，致关税及金融权操之外人，深望政府委员本其经验解除此种束缚。”观此报道，不仅宴请名单中吕氏居第一名，且先一日在地方招待宋子文宴会上，吕超伯还代表鄂汉商界发言。可知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吕超伯在鄂汉商界老大的地位又重新确立。

主持召开“一纱”股东会议。《民报》1935年6月25日报道，武昌第一纱厂（亦称汉口第一纱厂）筹议复工事，股东开会集议，会议主席为吕超伯，董事长周星棠作重要讲话。

总之，吕超伯这样一位民国初年鄂汉商界领军（一度可称名列前茅）人物，笔者未能检索到其生卒年。更让人不解的是，《民国人物大辞典》也没有录入吕超伯专条。故笔者不揣谫陋，将相关史料汇到一起，供史志界人士参阅。是为拾遗补缺。

张胜林，武汉晚报原言论主编，曾兼任江汉大学特聘教授

两枚徽章承载百年消防史迹

◇ 陆时正 徐莹秋

武汉消防博物馆珍藏着 30 余枚各式徽章，较早的有北洋政府时期的三等嘉禾章、万全保安会会员章和各地救火会证章等，诉说着武汉民间消防的义勇故事。

徽章是舶来品，伴随晚清洋务运动而兴起，徽章上多采用龙纹图案，象征皇权。到民国时期，徽章已十分流行，嘉禾取代龙纹作为主要元素之一，象征吉祥，也接地气。新中国成立后，国徽图案就吸纳了嘉禾元素。

徽章样式各异，基材多为铜质，有些正面镀有珐琅。民国时期的徽章，一般可按奖章、证章、纪念章分类。其中，奖章因其材质、造型及独有的历史价值而备受关注，

如北洋政府时期极富盛名的嘉禾章，1912 年 7 月设立，共分九等（后有变动），用于表彰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事业的人，授予等级按功勋大小及职位高低而定。

一枚国家三等嘉禾章

武汉消防博物馆珍藏的一枚三等嘉禾章，银质珐琅，多层结构，附有红底白缘领绶。外形为金银色八角，圆形中心为白底金色五束嘉禾图案，圆形边缘为绿圈。1916 年，汉口民间消防组织总机关——汉口各团联合会（以下简称团联合会）会长马刚侯（亦名



北洋政府时期的三等嘉禾章

德藩，字中骥，今湖北仙桃人）获颁此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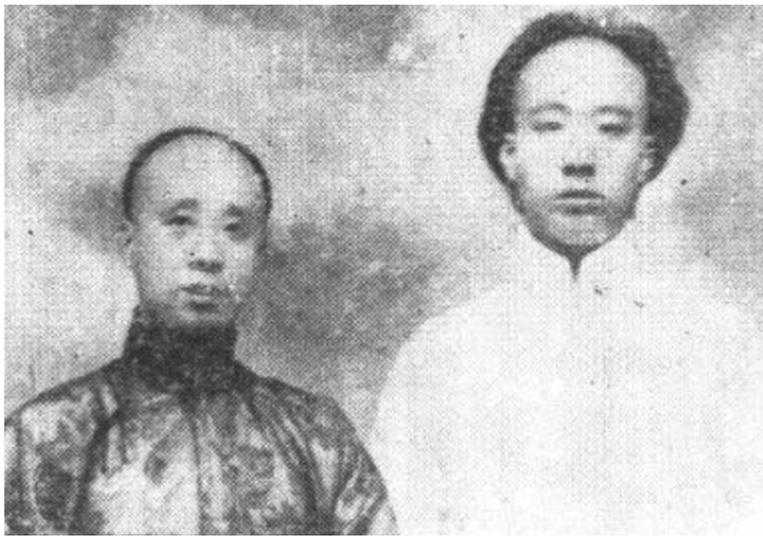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翌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0月7日，黎元洪公布《修正勋章令》，将嘉禾章划为勋章第三类，共九等十种：一、二等大绶嘉禾章，二至九等嘉禾章。各等以绶相别：一等大绶黄色红缘，二等大绶黄色白缘，二等无绶，三等领绶红色白缘，四等襟绶加结红色白缘，五等襟绶红色白缘，六等襟绶加结蓝色红缘，七等襟绶蓝色红缘，八等襟绶白色红缘，九等襟绶黑色白缘。

《修正勋章令》对颁授嘉禾章有严格规定：特任官（由大总统特令任用，如北洋时期国务院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省长等）初授三等；简任官（中央行政官除特任官外，共分九等，其中第一、二等为简任官，如北洋时期各部次长、多数司长、各省厅长、高等审判厅厅长等）初授四等，均可累功递

进至一等；荐任官（第三至五等为荐任官，如中央各部、局的科长、各省的县长）初授七等，累功递进至三等；委任官（第六至九等为委任官）初授九等，累功递进至五等。晋授勋章时，应将前授之勋章缴纳印铸局。勋章佩戴权除被褫夺或停止以外，可终身享受。

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周年，黎元洪颁令授勋，其中吴佩孚、王明文、马中骥等人获授三等嘉禾章。

马刚侯（字中骥）之所以获授三等嘉禾章，是对其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消防事业取得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汉口清吏闻讯遁逃，秩序大乱，商户歇市，社会惊恐。为维护治安，团联合会干事长马刚侯发动22个商团上街梭巡，此后又捐助粮糈，运送物资，救助伤员，支援民军，甚而领受千余枪支，荷枪实弹，依托地形优势，抵御清军反扑。清军冯国璋反攻受挫，经袁世凯授意，纵火焚烧汉口三昼夜，甚至枪杀救火队员，史称“汉口兵燹”。民军遭受重创，被迫退守武昌，团联合会会员四散。



汉口团联合会会长马刚侯（左）与长子马冠周（右）

民国初创，汉口商民复归，团联会重整旗鼓，在维护社会治安和举办公益事业方面功勋卓著，加之辛亥革命支援民军有功，故而授勋。

一枚汉口团联会三等奖章

嘉禾奖章是国家颁布的勋章，颁给某一领域贡献卓著的人士，但对于普通消防人员而言，可能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这就需要一套适用于普通消防员的奖惩制度——特别是对于从事纯粹义务、不予薪资的保安会消防员而言。

1919年4月，汉口安徽街5号的警钟楼落成，随后团联会迁入新址，即今武汉消防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厅所在处。迁址后，团联会先后颁布《汉口各团联合会褒奖消防条例》《汉口各团联合会章程》《汉口各团联合会选举规则》，会务为之焕然一新。

从1911年成立至1927年更名，团联会在17个年头里，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大革命等重要历史时期，留下了不少城市消防史料，在武汉消防博物馆的藏品中亦可见一二。其中一枚铜质镀银证章，中间为圆形，周边为四角十二线，正

面中心阳刻“文记”二字，背面阴刻“第六届七届消防员三等奖章”。

据查，“文记”是汉口一家银匠铺，表明该证章由其设计制造。证章镀银，但因氧化褪色难睹原貌，好在文字清晰可辨。那背面所刻“第六届七届”又代表什么？一届又是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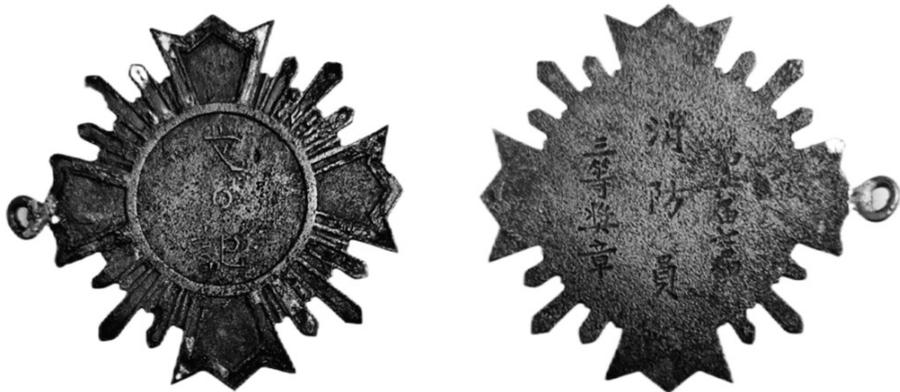
据1919年4月24日颁布的《汉口各团联合会褒奖消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五条规定“此项奖证奖章规定一、二、三等：一等银质金面，二等银质珐琅金面，三等银质本色”；第六条规定“消防员之义务以一年为一届，届满时由本会查照统计簿。凡到警场十分之九以上者得一等章，十分之八以上者得二等章，十分之七以上者得三等章。各会如遇邻会失慎，彼此出笼灌救，但风大火猛逾一时之久，不在此限。各会自不得放弃应尽之义务”；第十二条规定：“举行赠与奖章时，以联合会改选后，由前会长订期、新会长召集开一特别大会，柬请行政官厅、各界来宾及联合会新旧职员，全体当场一律赠与，惟奖证上须前会长、前消防股长连署盖章。”

由此可知，这枚奖章在换届时颁发，而团联会每两年改选换届一次。证章背面

“第六届七届”

若是指团联合完成第六届改选后与第七届交接，那问题就简单了。

1920年12月19日，团联合举行改选，“由（改选委员会）周韵宣主席报告第六届经过事实”“午



汉口团联会第六届七届消防员三等奖章（正、反面）

后二时，当众开柜，检票员检出票数，计马刚侯得136票，当选为正会长”，可见团联会第六届七届会长均为马刚侯。据此推断，此枚证章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颁发。但《条例》第六条规定“消防员之义务以一年为一届”，也就是说“第六届七届”可能指第六年到第七年期间消

防员到警场次数达到70%以上，符合授奖条件。《条例》是在1919年4月生效的，但制度的实施往往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从下一年度正式实施更具操作性。那么，第一届的统计时间段应为1920年1月至12月，由此推算，第六届七届应指1925年1月至1926年12月。两种推理均有据可循，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若按第一种推理，则第一次颁发奖章是从第六届七届开始；继续延伸下去，第四次颁发奖章应是第九届十届。按照团联会每两年改选一次计，第四次颁发奖章时间大致是6年后，即1926年底或1927年初。根据1927年8月27日《汉口民国日报》第6版“维持市面——团联会的通告”可知，此时团联会并未更名。这样，便出现与另一事实不符的情况，即第九届十届证章的实际颁发机构名称并非团联会，而是更名后的汉口保安联合会。

由此推断，第四次颁发奖章的时间应晚于1927年8月，在团联会更名为汉口保安联合会后，“将不属于消防事务的职责一概免除”，于是对《条例》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包括奖章样式、颁授条件、奖励分级等。显然，上述第一种推理不合情理。



汉口保安联合会消防股奖章第九届十届（正、反面）

那么，按照第二种推理，第一届颁发时间应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改选换届之时，为便于1920年整个年度统计，在1921年初颁发更具操作性。由此可知，第六届七届是指1925年和1926年两个年度，那么团联会第六届七届消防员三等奖章是在1927年初颁发的，此时团联会会长为周韵宣。第九届十届则指1928年和1929年两个年度，那么汉口保安联合会消防股第九届十届奖章是在1930年颁发的，此时保安联合会会长为蓝熙周。

通过对证章年代的考证，我们对团联会这一民间消防机构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回溯。可以说，每一枚徽章，都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陆时正，武汉市蔡甸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徐莹秋，江汉关博物馆藏品研究部主任

格里希无时不在我“身边” ——我给“洋厂长”当助理之二

◇ 李 兵

如果说《1984, 格里希在武柴“吃螃蟹”》(本刊2024年第11期刊载)讲述的是格里希“治厂之道”的大动作,那么这里想回忆一下格里希“为人之道”的小故事,包括这位外国老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情意。

在武柴爱吃“小零食”

格里希是1984年9月20日下午到达武汉的,武汉柴油机厂党委谢书记和吴副总工程师到汉口火车站迎接,乘坐一辆国产面包车来厂,在厂幼儿园一间办公室举行简单的欢迎晚宴。

从这餐简单的晚宴开始,格里希对我国宴请中的菜肴浪费现象非常不习惯,多次

直言自己的感受,甚至在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见他的时候也“提意见”。

格里希在武柴期间,对饮食不讲究。当时,我们还没有欧洲那种可以放到面包机烘烤的吐司面包,给格里希做饭的孙师傅便想了个办法,把馒头切片烤一烤,格里希挺喜欢的。果酱嘛,偶尔可以在武汉或是北京买得到。把果酱抹在焦脆的馒头片上,格里希吃得很香。

除了烤馒头片,孙师傅的拿手好戏是“奶油花生”,因为格里希喜好吃花生米。实际上,这款零食并没有奶油,只是在花生炒熟后起锅去皮,在锅里熬好糖稀子,再把花生米下锅翻炒。待糖稀子均匀粘上花生后关火,一边撒奶粉一边翻炒,凉下来后就有

一层“奶油”结晶包裹花生。格里希十分爱吃，以至于出差去外地参观或演讲，孙师傅还提前做好一包，让他带在路上吃。

在海南参观“罢宴”

1987年5月，在格里希卸任回国半年后，武汉市政府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在一个小范围的交流中，格里希反复直言：“中国的宴请浪费太大。德国人吃的饭是按量制作的，有不剩饭菜的习惯。我经常接受中国人的宴请，吃剩的饭菜都倒掉了，这方面的浪费使我们外国人感到吃惊。我们私下议论，认为还是节省办事好。你们国家如果把宴请倒掉的剩饭菜省下来，一年就可以节约上百万元。”“我夫人在中国住过几周，曾为中国人在宴请上的浪费几夜睡不着觉。她为宴请上的浪费而痛心。为什么人们在家里教育孩子点滴节约，而对宴请客人那么大方、那么铺张浪费呢！”

格里希的这次访问，除了为武汉的企业做短暂咨询服务之外，武汉市政府还安排他去海南参观考察企业。格里希的知名度高，受到海南各地的热烈欢迎。有一个县为了表达对格里希的尊敬，特意安排一顿丰盛的宴会，满桌名贵的海鲜，还有非常稀少的海蛇，据说对治疗老年风湿病非常有效。但格里希面对热情的主人和丰盛的菜肴，不但不领情，反而不高兴，他表情严肃地说：“你们中国还很穷呀，有些地方吃饱饭的问题都尚未解决，为什么你们一次要吃掉这么多的菜肴呢？看到这些菜肴我心里在流泪，我吃不下去，我看着你们吃吧。”

格里希这么不讲情面来了个“罢宴”，



1987年5月上旬，格里希在海南参观

弄得大家有些尴尬。餐后，他对中方陪同人员说，“我每餐只要一条鱼、两样蔬菜就行了，坚决不吃任何宴会”。从那次以后，在海南其他地方的活动，再也没有为格里希安排宴会。

这次是格里希第二次到海南，在参观考察过程中仍不闲着，每到一处都非常认真地听取情况介绍，然后诚恳地提出咨询意见。海南汽车冲压件厂正在筹备海南汽车厂，格里希与筹备处人员一起面对蓝图讨论建厂事宜，他根据自己40多年的工作经验，坦率提出：空气压缩机、变压器等机器设备应合理布局，以减少能源损失，提高经济效益；而食堂、托儿所等福利设施，应放在职工方便的地方，得到工厂有关人员的赞同。

在上海考察“取消午餐”

1988年11月间，受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委托和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邀请，69岁的格里希为国产桑塔纳轿车的提速，考察上海市区及郊区的17个工厂。一次计划去崇明岛一家农垦系统的仪表厂，为了赶黄浦江



1988年11月29日，格里希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作质量管理报告

班轮的时间，早饭来不及在餐厅吃，格里希自己冲了一杯咖啡、吃上几片面包，就匆匆上路了。

还有一次在另一家企业访问，中午一起吃工作餐，炒了几个菜，格里希一再要求大家把盘子里的菜全都吃完，不要造成浪费。当大家这样做了之后，他满意地笑了。在上海期间，每逢吃饭的时候，他总要提到朱镕基市长提倡的“四菜一汤”，表示十分赞赏。

11月29日这天，由于上海方面的日程安排太满，以至于格里希没有时间吃午餐，他说：“以工作为主，取消今天的午餐吧。”

格里希这天的行程紧张忙碌：早上8:30，在上海市政府锦江小礼堂为500多名企业厂长及质量部负责人作质量管理报告；10:00赶赴安亭镇与上海大众汽车执管委成员会谈；14:00赶回市区，以便15:30与朱镕基市长会面。

在武柴回访照样下车间

1986年11月4日格里希卸任厂长后，月底和夫人回到德国，但他仍然心系武柴、

心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和武汉也没有忘记格里希，邀请他在1987、1988、1989、1990、1992、1993、1995和2000年访问中国，在各地参观考察企业、演讲企业管理经验。他以犀利的目光发现一些问题，向各级政府提出许多有益建言。其间，格里希多次回访武柴，照样下车间到生产线察看。

毫无疑问，大家难以忘怀格里希在武柴的“认真”和“较劲”。

同时，我还不能不提到德国退休专家局SES总干事长诺德西克先生，他也于1986年4月下旬来访武汉，到格里希工作的地方研究产品质量问题。

诺德西克对中国十分友好，大力支持同我国的合作。20年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SES向我国派出专家3000多人次，约占该组织派出专家总数的一半。仅为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改造和生产，就派出专家100多人次到上海指导，对我国的汽车工业发展颇有贡献。1992年，中国政府向诺德西克颁发了“中国国家友谊奖”。

2000年，市外办没有安排格里希回访武柴，因为武柴此时已面临破产清算。于是乎，一种“格里希走了，武柴倒闭了”的声音浮游于坊间，简单地把两者设立为因果关系，并在其间填充许多想象出来的案例加以推论。

许多奋斗过的武柴人，一直期待着武柴的美好前景，也理性思考着武柴倒闭的原因。老工程师万远淦的一段话，代表了武柴众多老员工的心声：“武柴的破产进行资产重组，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中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气候中的普遍现象。老树病树全部砍掉，土地重



1988年4月4日，格里希回访武柴时察看大件零件蒸汽清洗线



1986年4月，诺德西克与格里希在武柴产品试验室察看活塞副连杆使用情况

新耕耘，种上新的树苗，几年以后，又是郁郁葱葱一片！”

在家中接待武汉友人

格里希对一起工作过的中国翻译、助理等同事相当“念旧”，体现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1987年初，武钢采购代表团赴欧洲卢森堡等国，余维浩担任副团长，格里希得知后兴奋地说：“我要请你到我家里来做客。”

3月26日下午，从卢森堡到联邦德国卡尔斯鲁厄市的高速公路上，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在疾驰。车内，荡漾着中国音乐的旋律。格里希边开车边笑呵呵地问：“余先生，洋厂长亲自开着世界上的王牌车，长驱300公里专程接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

“非常高兴。”余维浩笑着说：“我不仅关注到您所说的呀，还关注到了您车上播放的中国音乐。”

格里希说：“回顾我们俩在武汉两年的合作，我很高兴。可以说，我在武柴有多累你也有多累呀。”

“您为武柴、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工

作。为提高柴油机的质量作出相当大的牺牲，正如我们国家领导人多次说的，中国人民感谢您！”余维浩用流利的德语表达感谢。

格里希放慢车速驶入了高速休息区，在路边电话亭拨通了150公里外他家的电话，高兴地对夫人说：“Hallo，艾迪，我接到余先生了。您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准备今天的晚餐吧。”

车到了卡尔斯鲁厄市郊布莱顿小镇格里希的家，格里希领着余维浩参观了这套200多平米的独栋房子，上下两层，装饰简洁，墙上挂着埃及壁毯。

格夫人做好了晚餐，端来稀饭和番茄蛋汤。到底是外国人，稀饭里的米还是一颗一颗的，并且放了盐。格里希拿出一瓶小镇上能买到的最好的莫赛尔红葡萄酒，指着一桌子的糕点、牛排、猪排说：“这些是我夫人的拿手戏。请吧。”

第二天，格里希驱车50多公里，带着余维浩游览海德堡——这里是格里希的出生地和上小学、中学、大学的地方。格里希还带着余维浩，去看他曾经工作和退休的地方。



1987年3月，格里希在家中接待余维浩

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日下午，余维浩与格里希相处两天两夜。老友相见，谈不尽的话题，聊得最多的还是在武柴的两年，那难忘的日日夜夜。

周日的下午，奔驰轿车又启动了，格里希驾车依依不舍地把余维浩送回卢森堡。路上，格里希依旧兴致不减：“还记得吗？在1986年的一个多月里，我写了26万字的治厂方案，您就同步翻译了一个月。我写秃了钢笔尖，您换了20多支圆珠笔芯。我们两人的脚肿得连拖鞋都穿不上了。”

格里希沉浸在回忆中：“我在1986年11月武柴的离职大会上讲，‘我一刻也不会忘记一起工作两年的翻译余维浩先生的功劳’。我预期的目标达到了，证明武柴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那么，这种成功，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1992年元月初，我去德国游学，先飞到法兰克福机场，目的地是德国南部城市弗莱堡。按照与格里希之前的约定，我在中国启程前发去电报，告诉他乘坐新加坡航班

到达法兰克福机场的时间。不知为何，这份电报没有准时送达给他。

当我在清晨6点多钟到达法兰克福机场给格里希打去电话，他老人家才知道我到了德国。这一天，格里希本来是准备开车去纽伦堡看望他儿子一家的，装满物品的行李箱已经在头天晚上放进了轿车的后备箱里，一早就要出发。

接到我的电话，格里希毫不犹豫地说：“你就在机场等着，我一会就开车过来接你。”约摸50分钟后，格里希接到了我。从机场到他家有130公里，格里希对我调侃道：“你可以算是中国来的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这么一个70来岁的老头，开着奔驰车到机场来接你，是吧！”

那天微微下着雨，到格里希家时，格夫人已在门口迎接我。这时发生了一个很细小的插曲：我的手提行李在外走廊白色墙面上轻轻蹭了一下，留下一点痕迹。格里希看见了，先用手去摸了一下，然后回到屋里找



1992年元月，格里希夫妇在家中为李兵准备午餐

了一块类似小学生用的橡皮擦，在墙面上轻轻擦了起来，一会儿痕迹没有了。

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格里希询问了一下飞行情况，安排夫人去厨房准备，提早一点吃中餐。在格夫人准备午餐的过程中，格里希也站在她身后，大家一块聊天。精彩的瞬间，就“停留”在我拍的这张照片上：格夫人手里在忙碌着，格里希在笑着交谈，神情特别自然。

吃完午餐聊了一会，格里希送我去开往弗莱堡的火车站。这个时候，细心的格里希想到：“哎哟，今天是星期六啊，咱们德国的商店一般都是周末不营业的，他李兵到了弗莱堡也买不了食品的。”于是，他让夫人去储藏室，拿来一大块葡萄干黑面包，还给我包了几个香蕉等。到了火车站，格里希给我买了去弗莱堡的车票：“好吧，希望你学业顺利，有空经常跟我联系！”

我在德国游学结束后，1995年回国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热潮，先后在多家外资、合资企业工作20多年。在一家英国政府半官方贸易促进机构武汉代表处任首席代表7年多，在一家英资制造精密天平的武汉公司任总经理4年多，在一家法资高端发动机测试设备公司任总经理6年多，在一家中国与丹麦合资的汽车部件公司供职近4年。

无论在哪家公司，随处都可以从我的工作身影里“见到”格里希先生。在日常事务中，在每周的晨会上，在巡视车间的途中，在处理各种紧急商务的过程中，格里希先生无时不在我的“身边”。他见证了我职业生涯中的成长，见证了中国兴旺发达的艰辛和速度……

格里希，是第一位由中央引智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邀请出席1986年国庆招待会的外国专家，也是首位由德国总统授予佩带大十



硚口古田都市工业园格里希铜像

字勋章的德国来华专家。

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先生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享年83岁。

2005年4月17日，在格里希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时候，武汉和杜伊斯堡分别竖立了他的铜像，中德两国人民都会缅怀这位“好老头”。

李兵，格里希工作助理，后任法国迪特动力（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民间文献《灵泉志》中的明楚昭王墓营建（下）

◇ 李 贝 宋 贝 李绿雨

考证二：楚昭王营葬龙泉山的时间

张通《上楚端王书》言：“今历昭、庄、宪、康，凡四世矣，并不茔葬，今年卜地，明年卜地，凿山岗，断龙脉。”^[1]汤铭新也认可张通《上楚端王书》所言，在《灵泉序》中写到：“嗣是有术士传仙子，指灵泉为大地，因心图之，历昭、庄、宪、康四王，皆未营葬，及弘治十二年己未，竟为靖王所夺。”^[2]虽然正史中并没有楚昭王下葬时间和地点的确切记载，但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年）明朝官方修订的第一部地理志

书《寰宇通志》却记有：“楚昭王墓、庄王墓、宪王墓俱在府城东七十里灵泉山。”^[3]可知，景泰七年之前，楚昭王就已经葬入龙泉山。由此，《上楚端王书》《灵泉序》所言楚昭王在楚靖王时期才营葬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20世纪90年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昌县博物馆联合对楚昭王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一方“大明楚王圻志”。据圻文，楚昭王于“永乐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以疾薨……以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葬于国之东南灵泉山之原”^[4]，即楚昭王薨逝后三个多月就葬入了龙泉山。此外，网络上还流传有楚昭王元妃王氏的圻

志。王妃薨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十一月,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葬入龙泉山^[5]。两方墓志也足以说明,楚昭王安葬之地应该由始至终只有龙泉山,并不存在停棺待葬或迁葬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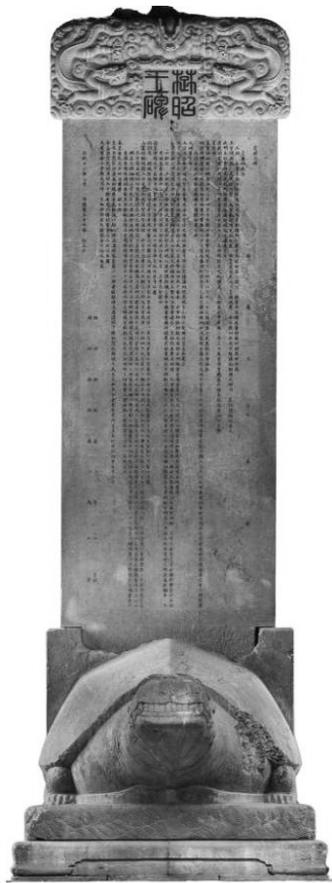
楚昭王石圻志

即便如此,相关质疑依旧存在,究其原因一是《灵泉志》文本内容极具故事性,经过数百年的传播,在民间已深入人心。二是据“楚昭王碑文”,楚昭王碑为正统十二年(1447年)所立,《明英宗实录》也有正统年间楚宪王、康王请旨为昭王、庄王撰文树碑过程的详细记载^[6],似乎正统年间楚昭王墓还在修建。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营葬之事涉及与朝廷之间的上通下达、用地用工、随葬器物与建筑材料的制作及运输、具体坟墓莹园修建等诸多事宜,在通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仅三个多月就完成如此浩大、繁琐的工程似乎不太可能。

关于楚昭王碑的问题,《明英宗实录》

就可以解答。另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靖江王朱佐敬奏请朝廷为其父悼僖王立碑,礼部直言洪武、永乐年间没有为亲王及郡王立碑的先例,英宗最终驳回了靖江王的立碑请求^[7]。正统八年(1443年),梁府奉承副阮留也奏请朝廷为薨逝的梁庄王赐文立碑,英宗仍以无此先例的理由驳回^[8]。可见,明代亲王墓一般是不立碑记的。因此,不能借由正统年间立碑之事,就推断楚昭王未及时安葬。在给楚宪王的一封信中,英宗写到“仰惟太祖高皇帝封建楚国,昭王、庄王世有令德。宗藩之贤,楚为首称。叔自袭封,恭谨茂著。兹以孝闻,谅足匹休前人,仪式宗藩。”^[9]这或许就是英宗破例为楚昭王、庄王赐文立碑的主要原因。

关于楚昭王墓的工程时间问题,虽然楚昭王妃薨逝时间早于昭王,但当时的昭王仅三十有余,修坟建园为时尚早,最为重要的是不合礼法。如若昭王墓与前文提到的鲁荒王墓一样,为身故后先建坟安葬,享堂、周垣等地面建筑后期再逐渐完善也就可以解释了。



楚昭王碑

亲王享堂后建的情况，除了鲁荒王墓，还有秦愍王墓、伊厉王墓等。秦愍王薨逝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而据《明太宗实录》，其享堂始建于永乐八年（1410年）^[10]。伊厉王朱橚薨逝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宣德元年（1426年），其子伊王颺快还在上奏“父厉王坟园享堂未建，及本府宫殿年深损坏，请免护卫军士屯种，俾之用工，工毕下屯。从之。”^[11]。《灵泉志》中之所以会有楚昭王并未营葬的叙述，可能也不完全是龙泉乡绅的臆造，而是有意将后期营建享堂、城垣等地面建筑讹传为营建坟茔，混淆视听。

考证三：楚昭王营墓东迁樊哙墓

张聪《灵泉樊侯墓碑》云：“明弘治年，楚王营昭寝，掘出墓志，果是樊哙之墓……楚王见哙形，心惊服，许以重祭，葬之寝东，如王礼。”^[12]但经查阅有关志书，景泰七年（1456年）《寰宇通志》、天顺五年（1461年）《大明一统志》、嘉靖元年（1522年）《湖广图经志书》、万历十九年（1591年）《湖广总志》、崇祯三年（1630年）《大明一统名胜志》，甚至是《康熙江夏县志》中，均没有樊哙墓在龙泉山的记载。最早的官方材料见于《乾隆江夏县志》：“樊哙墓在灵泉山天马峰下，明楚庄王夺其地葬昭王。凿之，才洞其窞，云滃然出至半空，现哙身，王拜祝，以王礼改葬，迁其墓于左，每岁王祭墓必先祭樊墓。”^[13]而《乾隆江夏县志》的编修“无问残碑断碣家乘野史，苟有可采，皆足以补纪载之缺”^[14]，其内容取材于《灵泉志》原志的可能性极大。具体到樊哙墓的记载，其与张聪《灵泉樊侯墓碑》的文本内容极其相似，推测采录于《灵泉樊侯墓碑》。

关于樊哙墓址，除了龙泉山，还有陕西樊川和汉中、河南舞阳、安徽六安、湖北黄冈等多种说法。作为西汉开国将领，不少学者认为，樊哙更有可能同萧何、曹参、周勃等功臣贵戚一样，陪葬汉高祖的长陵。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毅甚至认为“樊哙葬武昌的可能性最小，颇疑樊哙迁墓之事为讹传，或由其他樊氏附会而来”^[15]。在《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刘毅还提到，根据当地人的讲述，移樊哙墓故事的由来，出自一方展示于楚昭王享殿里山东王某的刻字石。其内容如下：“壬丙兼亥巳」戊申监修」灵泉特结许多年粉黛三千云外悬」惟有吉人获吉地山环水绕福融融」壬山丙向局全真出脉峯高龙有神」得此信然关福分慈云常护后来人」安邑山人东山氏王化龙题」。”

“壬丙兼亥巳”为风水学的一种方位布局，石碑内容也与风水有关，王化龙应成为一名风水先生。石碑为戊申年监修。明朝戊申年有洪武元年（1368年）、宣德三年（1428年）、弘治元年（1488年）、嘉靖二十七



王化龙题碑

年（1548年）、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而《灵泉樊侯墓碑》所记掘出樊吟墓志、迁樊吟墓之事发生于弘治年间。《灵泉志》很多叙事文本虽有错讹，但并不完全是无中生有，而是龙泉乡绅出于自身利益故意篡改了部分史实。这也符合民间文献既反映部分真实，又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特点。由此推测，王化龙题碑可能修建于弘治元年（1488年），而龙泉乡绅为了合法化在龙泉山土地的所有权，借由王化龙题碑之事，编造了楚府营建楚昭王陵寝东迁樊吟墓的故事。

考证四：楚昭王营墓强占龙泉乡绅土地

沈宝之《灵泉八大缙绅总序》载：“明楚藩昭、庄、宪、康、靖、端、愍横行肆虐于八家，毁其牌坊，掘其坟坑，夺其宅第，视其流亡，则蜂蚕荼毒之余。”^[16]虽然楚昭王元妃王氏、楚昭王分别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葬入龙泉山，楚藩与龙泉乡绅的渊源，最早势必要追溯到楚昭王时期，但楚昭王时期，甚至到庄王、宪王、康王时期，楚藩与龙泉乡绅还并没有因土地问题产生实质性的纠纷。樊镛《灵泉山记》记载：“国朝洪武初时，张、沈、邹、李复起为集，五十余年比宋元更有加焉。今上征市之法，虽不过钱。民力宽然有余，而绝口不言贫。市中人大抵多秉礼义，而少起争讼。岁时伏腊，具酒浆，读法律，咸遵约束，是以处华不奢，人纷不乱，而一二淳宠之风，和乐之气，浸于人心，征于里左，犹有先王遗民焉。故可嘉而可美，可述而可志也。”^[17]樊镛为景泰庚午举人，也就是说至少到康王时期，龙泉山还是一片欣欣向荣、和睦欢乐。

洪武三十年（1397年），“晋世子济

熿将葬恭王，欲得民地千一百余亩为寝园，遣使入奏。上命以八百亩为限，而以附近官地偿民，仍量地多寡给钞加赐之”^[18]。楚昭王、庄王、宪王、康王营墓虽然占用了原来龙泉乡绅的土地，但应当也是以换地或其他和平的方式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朱氏宗谱》称，楚王“将外地买三亩掉一亩换出。只有沈阁老不允，与楚王面圣。皇上劝语，沈阁老推让，赐沈姓朱。掉出方城一段”^[19]。换地、赐姓之事在《灵泉志》八大家的叙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沈氏“至曾孙天泓，因楚藩拨换灵泉地，迁居太平庄”^[20]、曾氏“玄孙仲贤，正统初举明经进士，拨换住基于楚府”^[21]、“又潘缙，本姓董，成化丁酉科举人，为姑母之嗣，楚府拨换灵泉里”^[22]、“后又有沈天爵、沈天贵畏藩势，换居宅于端王。王深喜之，赐以朱姓”^[23]等等。

关于楚藩与龙泉乡绅夺地冲突的始末，从张昌亮的《拨换灵泉山事实》^[24]可以窥见一斑。正统十二年（1447年），居住在内山的邹元儿、邹林森将居宅换给康王，“众姓未换”。成化元年（1465年），靖王托张姓族人张钟灵向灵泉乡绅提出换地，“众亦弗许”。弘治二年（1490年），靖王亲自面谈换地之事，再次遭拒。恼羞成怒的靖王，打破自己的脑袋，以血书上奏朝廷，控告龙泉乡绅谋杀，“众姓俱走”，唯“张、李二姓挺立不移”。正德六年（1511年），端王再提换地之事，“二姓终弗许”，于是连年加害，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尽夺张、李二姓之地。二姓虽被逼移居，但屡告御状申诉冤情。嘉靖十五年（1536年），嗣位的愍王“尽诛二姓苗裔，将内山八名家，外山四十八户，牌坊寝庙，窜逐毁掘”。龙泉山最终被楚藩所夺，成为楚藩的私家陵园。

虽然《灵泉志》中关于楚藩占地的多

篇文本，在叙事细节上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但总体而言，关于占地事件的发展脉络大体是一致的。正如张大友在对沈世昌《上楚愍王书》的批注中所写：“倾灵泉世家者楚靖，而非楚昭也，所以靖之后至愍而绝。”^[25]

楚藩占地的过程推测为：楚昭王、庄王、宪王、康王期间，楚藩以换地或其他和平的方式，取得了龙泉山部分土地的所有权，随之辟为陵寝。因楚王营墓占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龙泉乡绅住宅、祖茔的土地被大大压缩，到康王时期，已有乡绅不愿换地，但康王并未强占。到靖王时期，因换地被拒，靖王便诬告灵泉乡绅谋杀，由此夺取了张、李二姓以外龙泉乡绅的土地。端王嗣位后连年迫害，张、李二姓出于子孙安危考虑，也被迫迁出了龙泉山。到愍王时期，龙泉山的民众被驱逐殆尽，原有碑坊寝庙也被摧毁，龙泉山由此彻底成为历代楚王的陵寝。

结语

《灵泉志》是一部集中展示江夏龙泉山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补充了史书、方志记载的不足，对深入挖掘龙泉山历史文化资源，深化明楚王墓及楚藩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以及推动明楚王墓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但民间文献对历史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这就导致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灵泉志》收录的文本大多为龙泉乡绅所写，而楚藩与龙泉乡绅之间的夺地纷争“数十年叠案如山”，志中关于楚藩的记载，使用时需要进行甄别和筛选。

楚昭王朱楨就藩武昌后，恭慎畏事，执守礼法，对外平定了诸蛮叛乱，稳定了西南地区动荡的局面；对内爱恤国人，在国

五十余年不非理取于民，深受地方百姓爱戴，太祖、成祖称其为贤王。昭王薨逝，成祖不胜哀悼，辍视朝七日，遣官赐祭，命有司治丧，葬龙泉山。

楚昭王墓的选址、陵园布局为楚后嗣八王所承袭，陵园用地的不断扩充，也激发了楚藩与龙泉乡绅的土地纠纷。虽然官方史料未有对楚昭王墓营建的详细记载，但比照其他史料，楚昭王墓从选址、用地到修建、安葬应当都是得到朝廷批准的，并不存在《灵泉志》所述强掘朝廷命官祖坟、强迁樊吟墓、因土地问题未及时安葬等情况。只是因为楚藩与龙泉乡绅的夺地纠纷愈演愈烈，为捍卫自己的利益，龙泉乡绅对事件进行了加工改造，在数百年的口耳相传中最终演变为《灵泉志》中的故事文本。

注释：

[1]（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3页。

[2]（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3]（明）陈循撰：《寰宇通志》卷五十五，民国三十六年玄览堂丛书续集影印明景泰间刻本。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5]涂明星：《龙泉山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开发价值》，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5页。

[6]《明英宗实录》卷九十四，正统七年七月“丙戌，楚王季琬奏欲于昭园、庄

国立碑，表扬先德。上从之……”。《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正统九年八月“申子，书复楚王季淑曰：‘承喻究王尝请立昭园、庄园碑，已命儒臣代撰文，并碑额附去，可量宜砬石镌刻，叔其亮之。’”。

[7] 《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七，正统二年十二月乙亥。

[8]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四，正统八年五月甲子。

[9] 《明英宗实录》卷八十九，正统七年二月乙卯。

[10]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一，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

[11] 《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宣德元年四月辛未。

[12]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7-179页。

[13] (清)陈元京修、范述之纂：《乾隆江夏县志》卷十五古迹十六，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14] (清)陈元京修、范述之纂：《乾隆江夏县志》序一，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15] 刘毅：《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78页。

[16]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9页。

[17]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6页。

[18]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己未。

[19] 《朱氏宗谱(宝善堂)》卷二。

[20]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

第270-271页。

[21]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5页。

[22]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5页。

[23]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9页。

[24]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9-131页。

[25] (清)汤铭新、汤盘辑纂：《(道光)灵泉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2页。

李贝、宋贝，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馆员；李绿雨，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助理馆员

从战国弩机到共和国女子交警队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

◇ 周 斌

警察史是社会发展研究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警察史的社会史是不完整的。湖北警察史博物馆由湖北警官学院创办，前身是2008年6月建成开放的湖北警察史陈列馆。2010年5月，更名为湖北警察史博物馆并对外开放。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展示从先秦到现代湖北警察、警政演变的历史足迹，展现湖北警察从萌芽到成熟、从简单到完备的历史画卷。漫步这座主题鲜明的博物馆里，通过丰富的馆藏文物和讲解员的娓娓解说，可以循着文物踪迹，透过历史风雨，感受警察领域特色文化的魅力。

展馆面积1200平方米，根据时代和湖北警察发展规律，分为古代、晚清、民国、共和国四个部分。观看展览，可以了解古代警察职能的演变、张之洞在武昌裁撤保甲创立警察机构的首创意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公安机关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努力和辉煌业绩。同时，展览还特别以校史馆的形式，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湖北地区的最高警察学府——湖北警官学院的发展之路。

中国警察史上的“九个之最”

警察工作属国家保障型社会管理系统，警察是一种独特的行业，警察博物馆搭建了一座向社会展示警察、让社会了解警察的桥梁。

从1999年第一家警察博物馆在上海诞生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兴建警察博物馆。2008年，在湖北警官学院内，湖北警察史陈列馆应运而生。创办之初，面临着藏品匮乏的困境。为了充实场馆，采取买、借、仿、赠等方式丰富展陈。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

已收藏湖北地区自春秋战国至今的历史藏品4000余件，其中实物1000余件、图片3000余张。

警察史博物馆的展览极富特色，主要以中国警察史上与荆楚相关的“九个之最”为脉络布展：

最早制造的警用连发“手枪”——战国弩机。1986年在荆州秦家嘴47号楚墓发掘出土，可装弹箭连发20发至30米左右，其形体和功能颇似现代手枪。

曾担任最高警察治安官职的著名诗人——屈原。在楚怀王时期，屈原官居左徒，相当于今日分管公安、外交的“副总理”。

曾担任最低警察治安官职的汉朝皇帝——刘邦。刘邦曾任秦朝沛县泗水亭长，可算是中国警察史上最著名的“基层派出所所长”。

最早的警政类法律文书——云梦秦简。1975年12月，在孝感地区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土秦简，其中有中国乃至世界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现场勘察笔录、刑事询问笔录、法医勘验笔录和侦查破案报告等警政类文书。

最早以“警察”二字命名的近代警察机构——武昌警察总局。1902年6月6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武昌警察总局。

中华民国最早成立的警察机构——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武昌首义胜利后，经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批准，以警校学生为主组建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执行维持武昌城区社会治安的功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警局”。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中央情报保卫机构——中央军委特工处。1927年5月，在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领导下，在汉口余积里12号成立特工处，首任负责人为顾顺章。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基层政权保卫机构——中共鄂东北特委政治保卫局。1929年6月9日，鄂东北党组织在河南光山县胡子石召开鄂东北、豫东南八县联席会议，选举产生鄂东北特委，同时成立肃反委员会，后更名为政治保卫局。

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女子交警队——江汉女子交警班。1958年2月，武汉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成立由13名女队员组成的江汉女子交警队，此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接见。

汉代亭长抱盾迎宾石（复制件）

汉代亭长抱盾迎宾石，出土于河南许昌，属于空心门柱画像砖。说到亭长，我们都会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他在秦末时任泗水亭的亭长。亭是秦朝最基层的管理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除了接待过往行旅的食宿和公文传递外，还有一项重要职能，那就是维护社会的治安。

汉代画像砖是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载体，每一面都有其特殊内涵。拿这块迎宾石来说，正面的最上端是两棵常青树，树下是两个谦恭的亭长并排站立抱盾迎宾。



汉代“东井灭火”井栏陶器（复制件）

自古以来，人类与火有着不解之缘，从原始社会的钻木取火，到现在对消防安全的重视，火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稍有不慎也会成为毁灭一切的“恶魔”。



那么，古代的人们怎样灭火防火呢？东汉时期的“东井灭火”井栏陶器是一件墓葬品，外形就像一间房屋，上有屋顶，前有晒塔。前壁图案为灭火者健步奔跑，左手执水罐，右手拿旗子。旗子为直角梯形，旗上写有“灭火”二字，还挂有一摇铎铃。画面的右侧篆书“东”字，左侧篆书“井”字。“东井”，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井宿，因在“玉井”之东，故曰“东井”。东井象征着丰富的水，将“东井”刻于陶井之上，象征着防火功能。

南北朝仪制令石碑（复制件）

“仪制”是指朝廷颁布的法规礼节，“令”则带有法律的强制性。石碑中间竖刻“仪制令”三字，左右两侧从上到下竖镌小字“贱避贵，轻避重；少避老，去避来”，相当于一种交通规则，立于道路的两侧规范行人、车辆的过往。

所谓“贱避贵”，指普通百姓、奴婢

等要给达官贵族让路；“少避老”，指年少者给年长者让路；“轻避重”，指轻车轻骑及携带较少物品的人，给重车重骑或脚夫等让路；“去避来”，

指下坡人给上坡人让路，行人给同向相行的车马让路。“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与现代交通礼制的“礼让三先”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贱避贵”却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警察史博物馆充分发挥教育育人作用，积极推进高校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配合湖北警官学院每年为全体新生举办人民公安史讲座，组织开展“新生入馆”教育，纳入学院新生入学培训计划。时常举办“老警讲堂”，请工作30年以上老警察来馆，结合自身经历为学生举办公安实践讲座，丰富“第二课堂”。

利用馆藏资源开展育警文化活动，如“三人必进”活动——新生入学必进警史馆、教师入职必进警史馆、师生入党必进警史馆，增强人民警察的职业感、荣誉感、使命感。同时，以打造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为抓手，组织拓展系列相关活动。

从历史中来，到未来中去，警察的故事还在继续，信仰的火光必将长存。让这一件件展品，拥有比一代代人更漫长的生命，继续讲述警察的历史和故事，照亮未来的行程。

周斌，湖北警察史博物馆馆长

本刊 2024 年总目录

时代年轮

- 江汉关大楼百年风云 徐共和 (1.4)
- 1984, 武汉市树市花迎春问世
蒋彤云 杜宏英 (2.4)
-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追踪 谌达军 (3.4)
- 滨江公园: 新中国第一个亲水公园
肖捷 杜宏英 (4.4)
- 1984, 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启航
王钢 (5.4)
- 1984: 晴川饭店挺立武汉新高度
尹新秋 (6.4)
- 武汉三战长江特大洪水 吴世纬 (7.4)
- 荆江分洪工程的决策与建设
陈松平 (7.11)

- 1984, 周继红夺得中国首枚跳水奥运金牌
陈晓桥 (8.4)
- 1974, 武钢引进“一米七” 钟钢 (9.4)
- 华中工学院助跑武钢“一米七”
陈泽宇 夏增民 (9.13)
- 1954, 解放大道矗立新丰碑
简桦 (10.4)
- 1984, 格里希在武柴“吃螃蟹”——我给“洋厂长”当助理之一
李兵 (11.4)
- 1954, 武汉儿童医院和孩子一同生长
高琛琛 (12.4)

风雨同舟

- 亲密合作共创伟业的十个经典故事 (上)
胡照洲 (1.12)

亲密合作共创伟业的十个经典故事(下)

胡照洲(2.12)

梦想重回“大武汉” 叶青(3.14)

在城市发展中尽责建言 韩尚才(4.11)

同心同向的党派之“为”

刘浏(口述) 刘桂英(整理)(5.13)

人生的马拉松 余丹(6.11)

从文艺情怀到担当意识 喻球(7.17)

一名城建人的成长路 王飞(8.12)

我的参政议政“情结” 陶志阳(9.19)

我的民革路与黄埔情 周丽芳(10.15)

我为钢铁行业建言 牛琳霞(11.15)

以盟员之力体察“民之关切”

李奕(12.12)

九城同心

“忆从樊口载春酒”——诗文中的苏东坡与鄂州(上) 夏建国(1.20)

“步上西山寻野梅”——诗文中的苏东坡与鄂州(中) 夏建国(2.19)

“江湖水生鸿雁来”——诗文中的苏东坡与鄂州(下) 夏建国(3.19)

寻根“知音”世家——钟氏家族 朱绍斌(4.16)

蒲纺记忆:永远的二三四八(上) 胡沙岸(5.18)

蒲纺记忆:永远的二三四八(下) 胡沙岸(6.16)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的前前后后 刘俊明(7.21)

红色“徐家军”(上) 刘祖书 徐光思(8.16)

红色“徐家军”(下) 刘祖书 徐光思(9.24)

“鄂”史悠悠说根由

邱风 杨小杰(10.19)

金桥越天堑 通途润民心——武穴长江公路大桥建设纪实 张建军(11.19)

千年古城的蝶变——“蒲圻”更名“赤壁”纪事 冯晓光(12.16)

委员天地

以学促行,当好一心为民的“勤务兵” 向清耀(1.25)

做武汉“红楼”的守护者 魏德勋(口述) 章旷怡(整理)(2.24)

爱满江城,用汉绣传递美好 黄春萍(口述) 章旷怡(整理)(3.23)

为新时代“九州通衢”插上腾飞之翼 柴舸(口述) 章旷怡(整理)(4.21)

教育为灯,照亮孩子的未来 阮征(5.25)

以基金助招商 谱经开新篇章 姚莉(口述) 章旷怡(整理)(5.29)

工笔描绘时代,水墨渲染和谐 李乃蔚(口述) 章旷怡(整理)(6.23)

传德传医,做有担当的中医非遗传承人 吴启梅(口述) 靖涵(整理)(6.28)

助力基层治理,做红色物业的践行者 李钢(口述) 章旷怡(整理)(7.26)

在政协的跨越、突破与转变 丁启瑞(7.30)

崇真尚美,用纯粹的心剪裁服饰的美 孙菊香(口述) 章旷怡(整理)(8.21)

珍惜人生际遇 不负使命担当 鲍惜光(8.25)

一份政协提案,预警98年特大洪水 刘予伟(9.30)

做社会治理的法治护航者 陈昊(9.34)

从“以梦为马”到“以马为梦” 马茹菲(口述) 章旷怡(整理)(10.24)

活出生命尊严，爱心助力他人

熊菲 (10.28)

“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缩影”

邱玲 (口述) 章旷怡 (整理) (11.25)

红旅线上政协情

余红华 (11.29)

我与武汉杂技团共成长

梅月洲 (12.22)

商聚汉皋

争做汽车电子业的领跑者

郑海发 (口述) 高爱明 (整理) (2.28)

坚守“膳”心 不负“食”光

邢云 (口述) 闻夕 (整理) (3.28)

传承荆楚味道，做好“特产”文章

李福林 (4.26)

扎根武汉十八载 花香自有蝶飞来

姚良军 (5.33)

汉派服装的抉择和坚守

陈飞 (口述) 闻夕 (整理) (6.32)

我在靠山小镇当“镇长”

蒋舒晴 (7.31)

芯片征途上的冒险之旅

范陈杰 (口述) 许濛 (整理) (8.28)

做心脏守护者，为生命创可能

陈松 (口述) 闻夕 (整理) (9.38)

我与城市共赴“更新”之旅

胡江涛 (口述) 闻夕 (整理) (10.31)

智能天窗，透入我人生的光

孙汉超 (11.33)

人物春秋

“坚信马列志不移”——董必武早期思想的转变之路 (上) 田子渝 (1.28)

“坚信马列志不移”——董必武早期思想的转变之路 (下) 田子渝 (2.32)

从武汉三中体操队走出舞蹈人生

刘天喜 (口述) 刘宝森 (整理) (2.38)

从《姚锡光江鄂日记》看刘鹗争办卢汉铁路

刘飞 (3.33)

黄陂籍首届中央监委委员蔡以忱

陈华明 (4.30)

张难先传奇人生影像

侯红志 (5.39)

父亲涂允成的任教与治水生涯

涂光瑜 (6.36)

魏人镜烈士武汉足迹追寻

钟钢 (7.36)

博学中学首任华人校长胡儒珍

魏志刚 官剑琴 (7.44)

汉阳藏书家叶名澧略述

王晓清 (8.50)

我的老师陈潭秋琐忆

江定仙 (9.43)

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时的邓中夏

杨波 杨军 (9.46)

涂治，从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走来

裴高才 杜春华 (10.35)

刘绪贻，在珞珈山上迎接黎明

胡耀 尹加加 (10.43)

武昌起义后的鄂军将领季雨霖

魏德勋 黄婧 (10.49)

黄际遇在武昌高师创建现代数理教育

林才伟 (11.37)

“汉口中学”校友台静农 张爱清 (11.44)

武汉大桥工程局首任局长彭敏

王钢 (12.27)

清末民初武汉商界大亨吕超伯补传

张胜林 (12.35)

史海钩沉

1958年毛主席与武汉党代会代表合影照“解密”

侯红志 刘建林 (1.33)

武昌地名的由来与黄鹤楼故址

刘谦定 (2.43)

武汉蔡甸王公合葬墓志铭研究

宋 贝 张 剑 朱励博 陈守宇 (3.54)

武汉首战, 亮出“正义之剑”——苏联空军

志愿队援华抗战追踪之一 谌达军 (4.34)

美国飞虎队保存的一张老照片

肖春临 (4.43)

血洒长空, 保卫大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

援华抗战追踪之二 谌达军 (5.45)

库里申科和他的大队长战友们——苏联空

军志愿队援华抗战追踪之三 谌达军 (6.55)

《金口镇志》引录《金口镇即汝南旧治记》

指谬 胡晋鄂 (6.62)

老汉口的“洋码头” 李笙清 (7.59)

1900年汉口德租界堤防码头工程揭秘

范 榕 胡全志 (8.41)

一个法国人的武汉洋务运动观察

吴 敏 (8.46)

集家嘴的划子撞倒荡 田联申 (9.57)

向警予秘密埋葬处补乾亭“现身”

侯红志 (10.53)

民间文献《灵泉志》中的明楚昭王墓营建(上)

李 贝 宋 贝 李绿雨 (11.46)

民间文献《灵泉志》中的明楚昭王墓营建(下)

李 贝 宋 贝 李绿雨 (12.50)

都市史话

汉口大同医校: 华中第一所专科医学院校

王 钢 金文兵 (1.39)

解放初期武汉房屋的状况与修缮

方 宏 (2.60)

江汉关究竟何时“开”关

张胜林 范 榕 (3.39)

武汉系列童谣“三岁的伢” 彭翔华 (4.45)

旧江汉关的人事管理及薪酬待遇

黄文俊 彭 建 (4.52)

中法建交“第一团”轰动巴黎——武汉杂

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一 何忠杰 (6.45)

“咬文嚼字”黄鹤楼 张胜仪 (6.50)

非常时期搅热“冬日马戏场”——武汉杂

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二 何忠杰 (7.49)

救亡漫画宣传队与黄鹤楼大壁画

姚馨语 (8.33)

大使夫人组办中国民乐演奏会——武汉杂

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三 何忠杰 (8.38)

从黄陂大桥到双凤大桥 程竹怀 (9.50)

从汉阳造币厂到琴台美术馆 刘宝森 (9.53)

说“不服周” 朱建颂 (11.55)

“不服谄”来自京剧 姜照中 (11.57)

两枚徽章承载百年消防史迹

陆时正 徐莹秋 (12.40)

往事漫忆

周恩来总理关爱武汉杂技团

何忠杰 李成惠 (1.52)

医者仁心: 裘法祖院士采访拾零

尹新秋 (1.56)

武汉大学校园环境整治 徐应荣 任珍良

刘家旭(口述) 任 怡(整理) (2.55)

烧煤煮饭的日子 李肇文 (4.60)

李娜荣获首位“武汉功勋市民”

陈晓桥 (5.54)

《武钢文艺》: 六十年的情愫

董宏量 (7.55)

那个传说蛮多的“猫子”老师

周希正 (9.61)

父亲童世光的入党介绍人王平章

童晓晋 (11.52)

格里希无时不在我“身边”——我给“洋厂

长”当助理之二 李 兵 (12.44)

征稿启事

《武汉文史资料》创刊于1980年，是由政协武汉市委员会主管、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的公开发行人文史类期刊。2025年，本刊面向社会征集文史资料稿件。主要栏目如下：

【时代年轮】聚焦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以“逢十”周年纪念为契机，以党史、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为重点，以公众关注度和史实开掘性为基准，展现武汉前行的时代脉搏。

【九城同心】助推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战略实施，发掘兄弟城市地域文史资源，记叙具有全域影响和地域特色的近现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物遗址、典藏风俗、非遗传承等。

(下转第64页)

扫街探疑

民生轮船汉口公司旧址建筑探讨述

韩少斌 (1.60)

“巴公房子”百年石刻及“巴公”探秘

胡全志 (2.49)

寻找新中国武汉消防第一站 陆时正 (4.46)

江汉关不在英租界 田联申 (5.58)

汉口西门子洋行、美最时洋行旧址探讨

韩少斌 (8.56)

蛇山上的“十桂堂” 杜宏英 (10.56)

高校访馆

珞珈山上“飞来石”——武汉大学万林艺术馆

彭蛟 (1.47)

桂子山上的亮丽名片——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

罗松 (2.51)

大自然馈赠的珍宝——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

王若颖 (3.61)

南湖之畔的钱币宝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

黄丽 毛智周 马兴惠 (4.56)

民族文化的宝藏——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

陈桂 (5.61)

地质世界的科普殿堂——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

彭磊 唐晓玲 徐燕 (7.31)

藏身高校的“小省博”——湖北大学博物馆

李本义 贺兴义 蔡莹 李牧宸 (8.61)

泱泱大国礼乐兴盛的优雅回音——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

赵路花 (7.55)

楚菜文化与国际赛马的奇妙组合——武汉商学院校史馆

范勇 (11.61)

从战国弩机到共和国女子交警队——湖北警察史博物馆

周斌 (12.56)

【风雨同舟】讲述市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民主党派成员新时代履行职责、参加公益和弘扬正能量的故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委员天地】政协委员讲述开展本职工作、投身履职活动、参与社会服务的事迹、体会与感悟。通过讲好政协故事，传播政协声音，展示政协形象，推动政协工作。

【商聚汉皋】通过挖掘武汉异地商会及其会员企业闯市场、创品牌、谋发展的传奇故事，展现客商在汉创造财富的胆识、干劲和风采，助益本土非公经济发展。

【往事漫忆】深化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联系，记录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对某个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及相关人物的回忆，反映社会历史变迁。

【人物述林】由“人物春秋”更名，突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关注具有特殊经历的知名人物，反映不乏人生亮点的普通人物，构建丰富多彩的人物之林。

【都市寻踪】由“史海钩沉”“都市史话”合并，扣准武汉建城以来发展的历史轨迹，探求、搜集、整理、再现封存于历史的人物、事件、史迹或文化遗产。

【三镇拾遗】全面展示城市厚重历史文化，发挥各区政协文史委的作用，进一步开发各区人文资源，挖掘未经深入求证或充分认知的史实，反映文史工作新面貌、新成果。

【烽火江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突出主线，把握重点，采取专题连载与约稿征集相结合的方式，多侧面反映“战时首都”武汉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阅城偶记】利用扉页“卷首语”突出位置，围绕城市人文话题，对武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利用，进行解读和分析，提供一得之见。

【书画墨缘】利用封二、封三，向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征集书画作品，反映时代主题，典藏文史墨韵。

来稿要求：

1. 文章内容客观真实，事件细节具体，文风朴实生动，兼具史料性和可读性。
2. 提倡第一人称口述，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
3. 篇幅一般3000～5000字，提供相关图片，并配文字说明。
4. 文末请注明作者身份与联系方式，便于寄送样刊与稿酬。

稿件电子版请发至本刊邮箱 whzxwsz1@163.com，纸质稿件请寄：汉口沿江大道246号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联系电话：（027）82220669

本刊编辑部
2024年12月